



金融与发展

2023年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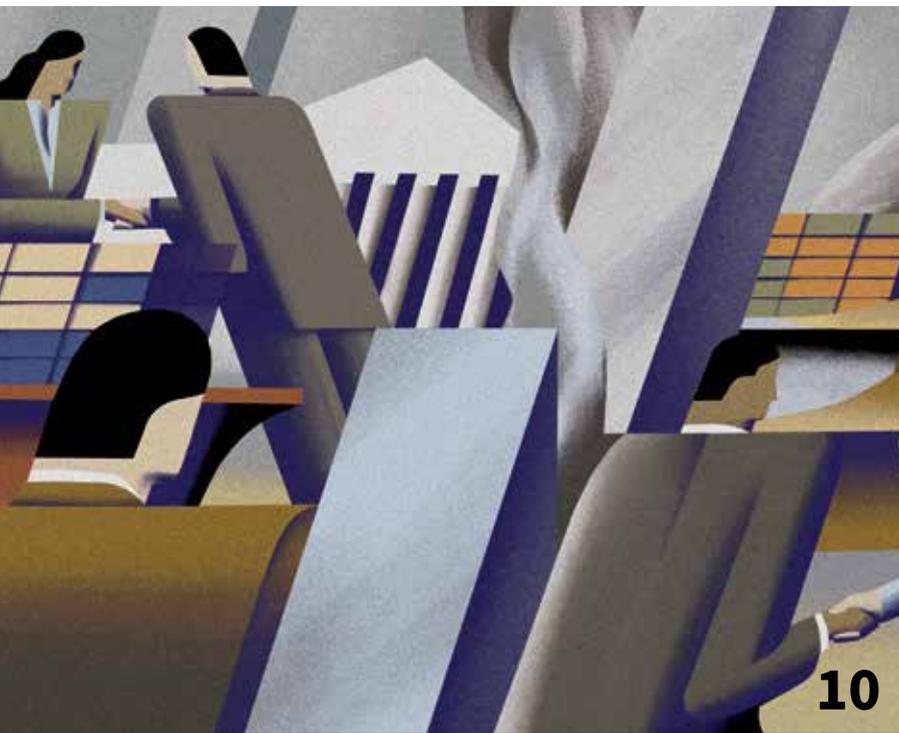
IMF和WTO负责人讨论
贸易的未来 第10页

采访安妮·克鲁格
第38页

无风险的资本主义
第62页

贸易扰动

目录



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仍有可能开展有意义的贸易合作。

贸易扰动

- 4 全球贸易的威胁与日俱增**
保护主义可能损害全世界的韧性、加剧不平等并带来更多的冲突
皮内洛皮·戈德堡和特里斯坦·里德
- 10 世界贸易仍能促进繁荣**
但国际架构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和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
- 12 产业政策回潮**
发展中经济体是否应当效仿美中，兴建国家龙头企业？
道格拉斯·欧文
- 15 相交的轨迹**
技术进步与贸易二者相互影响
卡罗琳·弗洛因德
- 18 出口管制带来的挑战**
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获得帮助来应对不断增加的制裁与出口管制
查德·鲍恩
- 22 绿色贸易的紧张局势**
绿色产业政策将推动脱碳，但其会给贸易带来多少成本？
诺亚·考夫曼、萨加托姆·萨哈和克里斯托弗·巴塔耶
- 26 全球贸易的未来方向**
现在是时候为实现可持续的未来重新构想全球贸易框架了
迈克尔·佛罗曼
- 28 经济安全的支柱**
今天的供应链扰动再次凸显了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拉尔夫·奥萨
- 31 歧视性区域主义的兴起**
在全球局势日益紧张之时，区域贸易联盟可能更多是一种歧视，而非一体化
米歇尔·鲁塔
- 34 地缘经济割裂的代价**
贸易扰动对全球生活水平造成的损失可能与新冠疫情同样严重
马尔金·博尔赫斯、陈嘉骞和本杰明·凯特



48

本期其他内容

44 超级大国正在背离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正为强国政治让步，这损害了发展中经济体

林奈莉

48 贸易是推动性别平等和发展的驱动力

国际贸易有益于女性，但只有坚定的政策行动才能获得回报

纳迪亚·罗恰和罗伯塔·皮尔玛蒂尼

58 老龄化——一颗真正的人口炸弹

老龄化是全球人口的主要趋势；新冠疫情可教会我们如何为其做好准备

大卫·E. 布鲁姆和利奥·M. 扎克

62 无风险的资本主义

美国政府决定承担硅谷银行无保险存款的损失，而这破坏了自由市场的纪律

拉古拉姆·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



56

部门聚焦

38 经济学人物

世界贸易的捍卫者

鲍勃·西米森对安妮·克鲁格 (Anne O. Krueger) 进行了采访，后者的研究帮助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但如今，这一贸易体系正受到威胁

42 前沿

决策者和谈判者

韩国前贸易部长俞明希 (Yoo Myung-hee) 谈经济割裂中的风险

52 图表释义

全球化的顶峰

贸易停滞不前、限制措施增加，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安德鲁·斯坦利

54 回归基础

补贴大战

合作与共识可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

伊丽莎白·范·赫维伦

56 咖啡屋经济学

难民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

联合国难民署的菲利波·格兰迪 (Filippo Grandi) 认为，难民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超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范畴

65 书评

《我们需要谈谈通货膨胀：过去两千年中的14个紧迫教训》斯蒂芬·金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发展与稳定：加勒比经验的理论与证据》德莱尔·沃雷尔

《元宇宙》马修·鲍尔

68 货币

关于货币肖像的思索

许多英联邦国家正在重新考虑钞票上应展现谁的肖像

斯米塔·阿加瓦尔

主编：Gita Bhatt

执行主编：Maureen Burke

副执行主编：Peter Walker

高级编辑：
Analisa R. Bala
Marjorie Henriquez
Nicholas Owen助理编辑：
Smita Aggarwal
Andrew Stanley数字编辑：
Kwabena Akuamoah-Boateng创意和营销：
Rose Kouwenhoven
Marta Doroszcyk网页编辑：
Rekia Ennaboulssi制作经理：
Melinda Weir文字编辑：
Lucy Morales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Steven Barnett
Helge Berger
S. Pelin Berkman
Yan Carrière-Swallow
Oya Celasun
Martin Čihák
Era Dabla-Norris
Mame Astou Diouf
Rupa DuttaguptaDavide Furceri
Kenneth Kang
Subir Lall
Raphael Lam
Papa N'Diaye
Mahvash Qureshi
Uma Ramakrishnan
Daria Zakharova

©20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版权所有。

如需翻印本刊内容，可通过填写在线表格 (www.imf.org/external/terms.ht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pyright@imf.org 进行申请。如用于商业用途，可通过版权税计算中心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www.copyright.com) 获得授权，并支付一定的象征性费用。

本刊的文章和其他资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

订阅服务、地址变更和其他广告事宜，请联系：

IMF Publication Services
Finance & Development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Telephone: (202) 623-7430
Fax: (202) 623-7201
E-mail: publications@imf.org

《金融与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季刊（地址：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中文版刊号：ISSN 0145-170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动荡中的贸易

“全球化是活生生的现实，但我认为我们低估了它的脆弱性。”大约二十五年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 (Kofi Annan)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这样说到。自冷战结束以来，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一直支撑着和平与繁荣。但如今，这一体系的脆弱性充分显现了出来。

一些政策制定者认为全球化对国内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试图降低其对不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程度。甚至连曾经倡导自由贸易的国家也正转为实施内顾型政策，以求与竞争对手隔离开来，并确保从计算机芯片到稀土的各种战略供给的安全。

在本期《金融与发展》中，我们重点关注了破坏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力量，例如俄乌战争和地缘政治割裂。我们还研究了当今的技术如何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并讨论了政策优先事项（如气候变化和平等）。

人们对全球化的幻灭感与日俱增，这将导致一定的后果。耶鲁大学的佩妮洛皮·戈德堡 (Pinelopi Goldberg) 得出的结论认为，保护主义将使世界的韧性减弱，变得更容易发生冲突。达特茅斯学院的道格·欧文 (Doug Irwin) 表示，历史表明，实施产业政策和提供补贴可能会使各国的情况更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米歇尔·鲁塔 (Michele Ruta) 指出，全球局势日益紧张，这可能会降低区域贸易联盟的一体化水平，并引发更多的贸易歧视。而随着世界分裂成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可能会被边缘化。牛津大学的纳加尔·伍兹 (Ngairé Woods) 认为，有些人会发现一些国家与这些贸易集团保持距离是有利的。

但是，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Ngozi Okonjo-Iweala) 呼吁，各国应继续对贸易充满信心，应相信贸易是一股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变革性力量，并呼吁加强多边机构。其他撰稿人则主张达成新的政治共识，以妥善解决各方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各种竞争性需求，同时考虑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强化贸易体系以维护其带来的利益，同时避免遭受损失。正如格奥尔基耶娃和奥孔乔-伊韦阿拉所指出的，在新的贸易世界中，“我们不能止步不前”。

吉塔·巴特 (GITA BHATT)，《金融与发展》杂志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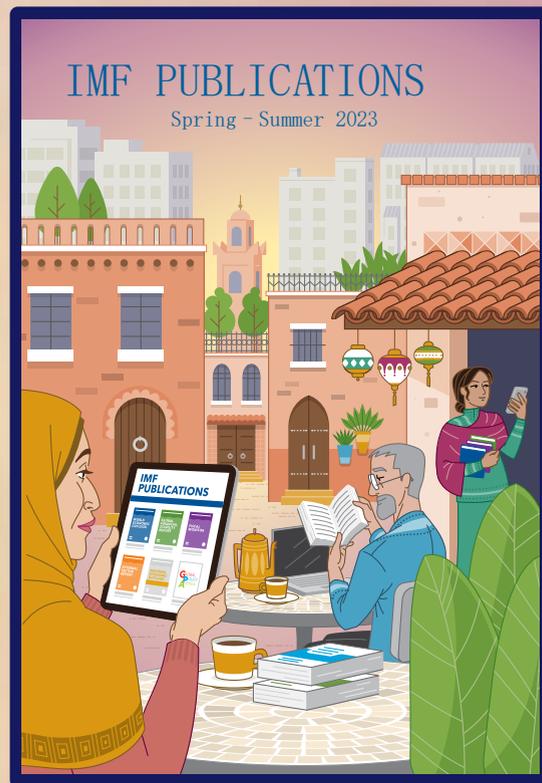


本期封面

乌克兰艺术家娜塔莉亚·舒尔加 (Nataliia Shulga) 创作的封面为2023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杂志设定了基调，其象征着国际一体化几近停滞，一些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或本国主义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下载最新目录，
了解更多关于
全球经济的
最新文章



出版物

全球经济 尽在指尖

[IMF.org/pubs](https://www.imf.org/pub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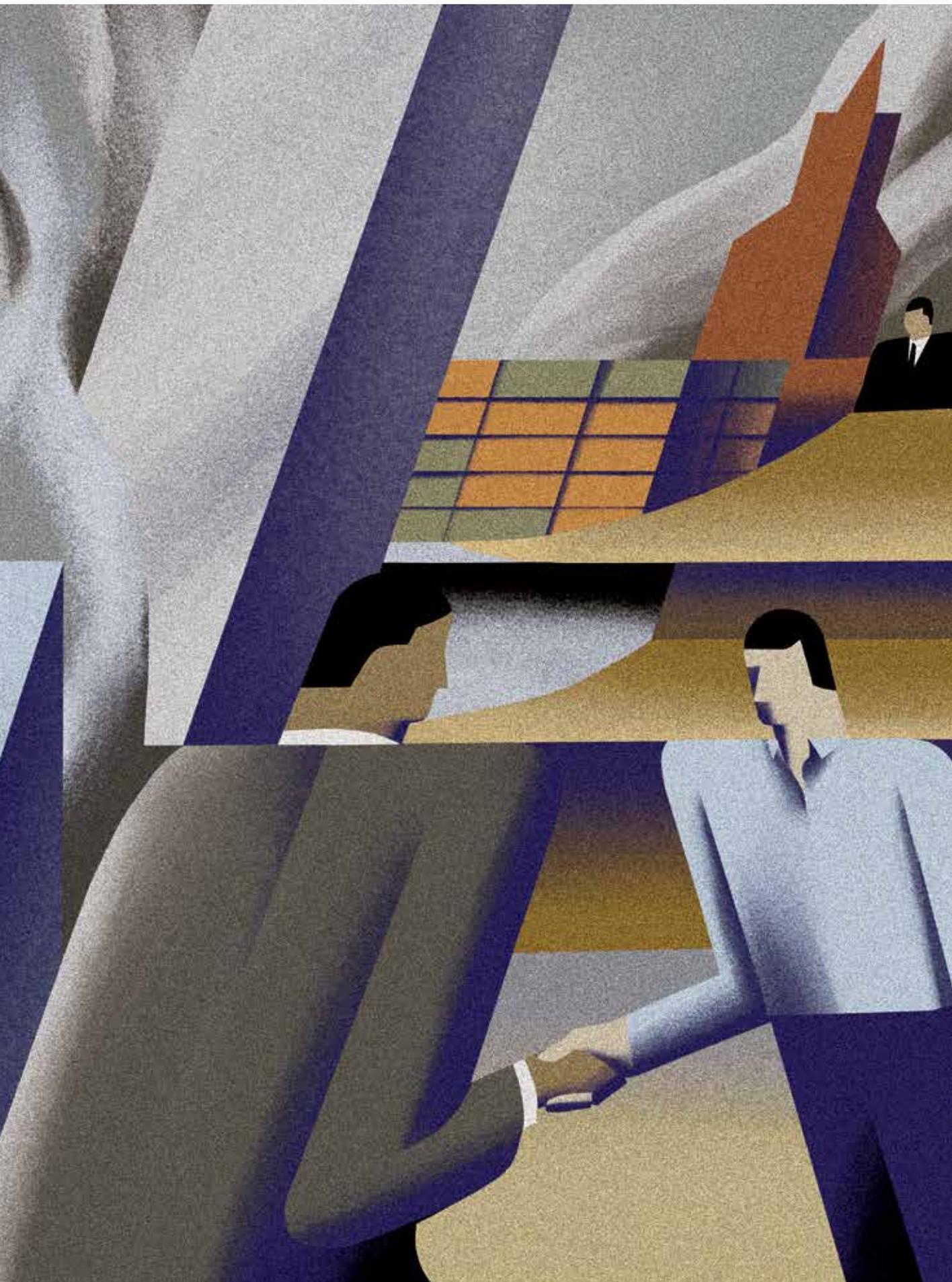




全球贸易的 威胁与日俱增

皮内洛皮·戈德堡和特里斯坦·里德

保护主义可能损害全世界的韧性、
加剧不平等并带来更多的冲突



插图来自：NATALIA SHULGA



四年前，本文作者之一曾为2019年6月号的《金融与发展》撰写过一篇有关贸易的未来的文章，其庆祝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5周年。那篇文章所传达的信息是：尚不存在有力的证据表明全球化正在倒退；但国际贸易和支撑它的多边体系正受到攻击；而其未来如何，将取决于各方的政策选择。自那以来，世界上一些最大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已做出了选择——他们停止进一步推进国际一体化，在某些情况下，还采取了保护主义或本国主义的政策。

今天，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国际贸易正在去全球化。以美元衡量，全球贸易增速在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有所放缓，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急剧下降。但自那以后，贸易已经反弹至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从占GDP的比重来看，全球贸易小幅下降，这主要是由中国和印度造成的——其中，中国这些年实施了“双循环”战略，其一方面优先关注国内消费，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开放（见图）。这反映出两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出口高速增长已告一段落，以及二者少于往年的中间品进口。但是，从占GDP的比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中间品进口量仍在增长。而出口也是如此。

美、中两国在2018年引入的关税并没有导致贸易的减少。正如预期，这些关税阻碍了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但对于受到关税影响最大的产品而言，两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有所增长。换言之，贸易只是得到了重新分配，而没有减少。关税战并没有阻止其他国家——如非盟、东盟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寻求区域贸易协定或诸边贸易协定。

新冠疫情导致许多国家暂时性地限制了药品出口；而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粮价的飙升，一些国家停止了小麦和其他粮食的出口。不过，仍有许多政府在积极追求经济一体化，例如达成协议让专业人士更易出国务工，或是形成共同的安全标准

来促进消费品的流动。

当然，贸易在对政策环境变化作出反应时，也会存在延迟。而政策本身可能滞后于公众情绪的变化。“国家安全”和“产业回流”等术语在新闻报道和研究论文中出现的频率都有所增加。也许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最近对经济学家开展的一项调查最能说明问题。2018年3月，100%的受访者反对美国最初加征关税。但到了2022年1月，受访者对全球供应链已经持怀疑态度：44位经济学家中只有2位不同意“依赖外国投入品使美国产业易受干扰”的说法。

政策和公众对全球贸易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各种不同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接下来又会怎样？

“超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超全球化”时代，与巨大的经济成就密不可分。世界银行定义下的极端贫困人口已大为减少，除少数制度薄弱的国家外，其他所有国家预计都将消除极端贫困，而这部分源于东亚国家经济的急剧增长。从人均收入来看，全世界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

在开放贸易的经济体中，消费者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购买全球各地的商品。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使人们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享受前几代人无法比拟的各式娱乐。航空机票价格下降，使人们能够访问其他国家，从而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这种体验曾经是超级富豪的专属体验。

许多因素促成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开放和其他市场化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发达经济体与（当时）低工资国家开展贸易，从而对发达经济体的商品价格和工资造成了影响，使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和出口经济体的劳动者受益。通胀持续处于出人意料的低水平——即便美国实施了量化宽松且债务增加，也是如此。

最后，西方世界经历了史上罕见的长期和平，这也促进了繁荣。20世纪末形成的全球各国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因素，

政策和公众对全球贸易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各种不同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接下来又会怎样？

它给了各国和平相处的动力。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战争意味着全球供应链的扰动，而这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可怕的影响——正如我们现在正发现的那样。

但在表面之下，强烈反对全球化的紧张矛盾正在升温。本文描绘了这场去全球化运动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15年左右，当时，对全球化的焦虑和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导致了英国脱欧、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实施报复以及欧洲极端主义观点的复苏。

全球反弹

平均来看，在21世纪头10年末全世界的生活水平已变得更好，但发达经济体的许多劳动者都感到自己落后了，比他们的父辈处境更难。大量经济研究讨论了这些分配效应，其中，地理因素明显发挥了作用：对低工资国家进口竞争敞口更大的群体（这源于先前存在的地域产业格局）比不存在这种敞口的群体处境更糟。

而这在美、英等国又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与此同时，全球化也造就了一些大赢家，这包括若干“超级明星”跨国企业，它们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高度专业化，实现了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这也包括高薪的个人，他们因市场的扩大和新经济机会的出现而收益颇丰。一些人落后了，另一些人则领先了。

主流经济学家需要时间才认识到了这些影响。但在许多方面，这种影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们反映了贸易产生的总体福利和分配冲突中通常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这些变化如此迅速、密集，从而给这种紧张关系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同样，经济学家的建议从本质上说也并不新鲜：大多数经济学家拒绝将保护主义作为

一种解决方案，且也支持以某种形式实现赢家向输家的再分配。

与此同时，西方政府日益担心与中国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使用了补贴，并对寻求进入其市场的企业施加了限制。这促使它们对中国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政策，这尤其是因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

当然，以前我们也曾见过对全球贸易的强烈反对，特别是1999年的西雅图抗议活动。但那些运动并没有影响政策。我们没什么理由认为，2015至2018年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会对全球化的未来产生永久性的影响。毕竟，整个世界的联系已经过于紧密，我们已无法回到旧有的状态。

新冠疫情的压力

去全球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始于2020年——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人们开始提倡“韧性”。但什么是“韧性”？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要定义、衡量韧性，则要取决于冲击的性质。例如，新冠疫情既是一种供应冲击（主要国际供应方在不同时间开展防疫封锁，使货物的交付被延迟），也是一种需求冲击（人们对医疗用品、汽车等耐用品及二套房的需求快速增长）。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国际贸易扰动造成的交货的短期延迟与短缺，被广泛描述为一场危机。但其中的许多其实都被夸大了——事实上，市场被证明具有极强的韧性（Goldberg和Reed，2023年a）。例如，美国从不同的国家进口了医疗物资。唯一的例外是口罩。但是在2020年，来自中国的口罩在几个月内便被运达了目的地，这意味着短缺得到了完全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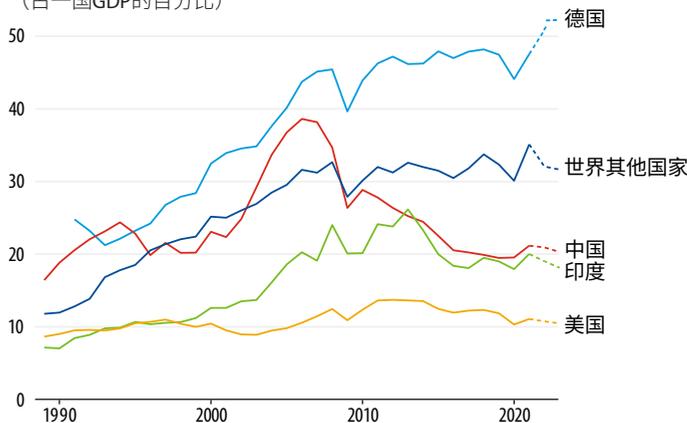
这些例子表明，国际贸易增强了韧性。

图1

贸易发展形势各有不同

在一些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贸易在GDP中的占比正在下降。

货物与服务出口
(占一国GDP的百分比)



来源：Goldberg 和 Reed (2023 年 a)。

同样，美国在疫情后实际上保持了贸易关系；其进口商与外国伙伴的贸易更加频繁，并在寻找新的供应商，虽然整体贸易量有所下降。其他文献表明，基于定量模型的模拟显示，国际贸易使经济更加多样化，因而也更具韧性（Caselli等人，2020年；Bonadio等人，2021年）。直觉上，各经济体之间的供应冲击的相关性低于各经济体内部供应冲击的相关性，且与多个供应商合作可以更容易地应对特定国家的冲击。

总体而言，强调供应链脆弱性的反对贸易的论点与证据并不相符。这些论点被用来煽动源于第一阶段的保护主义情绪，但最终来看，其起初的影响并不持久。2021年，随着全世界在疫情管理方面出现转机，贸易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地缘政治压力

第三阶段始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于公众来说，这凸显了国际专业分工带来的新风险。随着俄罗斯削减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以及能源价格的飞涨，依赖单一国家进口关键投入品的不利之处已十分明显。这些担忧本质上并不是针对俄罗斯的。但通过推测，一些国家开始怀疑：如果它们不得不在一夜之间与中国脱钩，会发生什么。政策制定者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这样做，则最好立即根据自己的条件实施脱钩。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被各方广泛采用，即国际福利是一场零和游戏。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逻辑、存储芯片以及其生产设备。半导体技术当然可用于军事，出口禁令可阻碍中国的军力发展。但这些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更多，因此这些禁令也阻碍了民用技术的发展。世界已经从一个鼓励所有国家开展贸易、竞争和创新的世界，转变为一个最发达经济体不仅寻求竞争、而且试图对他国实施封锁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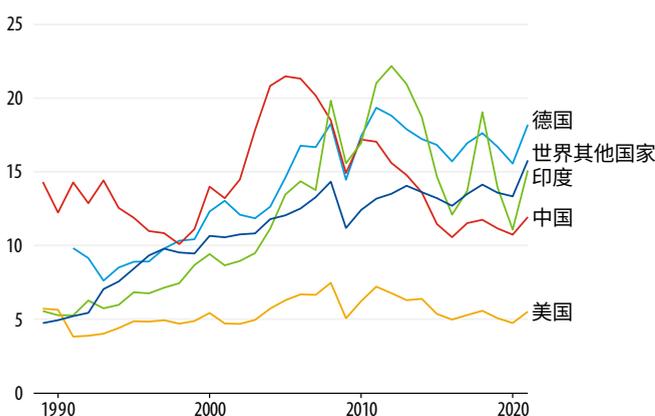
在当前时点上，任何预测都存在高度的投机性——因为与之前一样，未来的结果将高度依赖于政策选择。一种可能的结果是，

图2

中间品进口

在许多国家，用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中间品的进口继续增加。

中间品进口
(占一国GDP的百分比)



来源：Goldberg 和 Reed (2023 年 a)。

另一种可能性是，世界最终将分裂成敌对阵营，一场新的冷战将展开——这一次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冷战

去全球化运动也就将到此为止了：技术封锁措施将仅限于可信的双重用途产品，其他产品的贸易则将继续蓬勃发展。但另一种可能性是，世界最终将分裂成敌对阵营，一场新的冷战将展开——这一次是美国和中国（及其各自盟友）之间的冷战。后一种情况的结果可能十分严重。

新的冷战

许多长期经济增长模型都强调了人口规模在研发活动中的作用。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经济体预计会孕育出新的思想，发展出绝对优势——它们在各种产品市场中的领先地位即是证明。如果中美之间的科学合作破裂，世界应对下一次疫情的方案可能会减少。

更普遍而言，与“不友好”的伙伴进行切割，意味着放弃潜在的低成本供应商。例如，在脱碳方面，西方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远高于中国，该行业的估计结果表明关税减缓了太阳能装机速度。气候变化迫在眉睫。我们每拖延一年，就都会造成更多的损失，缓解气变的成本也会更大。

这是提高韧性的代价吗？限制全球贸易不太可能提高韧性。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如果脱离具体的冲击，我们就无法对韧性进行评估。只与“友好”国家进行贸易可能会提高一国的地缘政治风险韧性——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但友谊的概念本身会不断变化。这么做可能会降低一国对其他类型冲击（如近期的健康冲击）的韧性。

这也可能导致一国国内不平等的加剧。更多的贸易壁垒会导致更高的价格，这意味着更低的实际工资。全球化可能加剧了地域上的不平等，但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之道：它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各国都面临着全

球不平等加剧的风险。地缘经济割裂可能导致“友邦”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更多贸易。在贸易协定中更多强调环境、劳工标准，将给那些难以满足这些要求的极贫穷国家设定更高的进入壁垒。如果无法进入利润丰厚的外国市场，这些经济体将失去减贫和发展的明确路径（Goldberg和Reed，2022年）。

但面临最大风险的，可能是和平本身。冷战往往会引发热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世纪30年代，全球从多边贸易大幅转向了帝国（或非正式势力范围）之内的贸易。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转变加剧了二战前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只能希望，这种战争之前的时代，不会在未来几年重演。FD

有关此主题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我们在2023年3月《布鲁金斯学会经济活动论文》中发表的文章（“全球经济正在去全球化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下一步是什么？”）

皮内洛皮·戈德堡（PINELOPI K. GOLDBERG）是耶鲁大学ELIHU经济学和全球事务的教授，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中心的合作研究员。**特里斯坦·里德（TRISTAN REED）**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 Bonadio, Barthélemy, Zhen Huo, Andrei Levchenko, and Nitya Pandalai-Nayar. 2021. "Global Supply Chains in the Pandem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3 (November): 103534.
- Caselli, Francesco, Miklós Koren, Milan Lisicky, and Silvana Tenreyro. 2020. "Diversification through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1): 449–502.
- Goldberg, Pinelopi K., and Tristan Reed. 2022. "Demand-Side Constraints in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Market Size, Trade, and (In)Equality." Yal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ew Haven, CT.
- Goldberg, Pinelopi K., and Tristan Reed. 2023a. "Is the Global Economy Deglobalizing? And if So, Why? And What Is Nex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arch).
- Goldberg, Pinelopi K. 2023b. *The Unequ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世界贸易仍能 促进繁荣

但国际架构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和恩戈齐·
奥孔乔-伊韦拉

我们的这两个国际机构，是从长达三十年的灾难性去全球化、极端主义和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诞生的，其均秉承着一种理念：欣欣向荣的国际贸易与全球的繁荣稳定密不可分。总得来看，二战后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如今，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占比只有不到十分之一，该比例自1990年以来减少了四倍，原因就是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翻了一番。全球收入急剧增加的关键在于自1960年以来，国际贸易增长了20倍。

然而，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贸易的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限制和补贴措施不断增加。为应对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各国政府争相确保战略供应链的安全，仓促推行了扭曲性的贸易政策，从而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若操之过度，这些措施可能会为联盟导向型的政策敞开大门，导致经济效率降低以及全球贸易体系割裂。如果最终缩短的供应链更容易受到局部冲击的影响，那么这些措施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越来越集中在地缘政治结盟的国家。

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原有的想法，不再将贸易视为一种变革性的力量？毫无疑问，回答是“不”！尽管众说纷纭，但即使在最近的危机中，贸易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在未来几十年内，贸易有着很大的潜力来继续推动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机会的增加。

国际贸易对全球繁荣至关重要，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国际贸易可以扩大国际分工，进而提高生产率。第二，国际贸易可以提供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从而实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第三，当遭遇负面冲击时，国际贸易可以为企业和家庭提供宝贵的外部选择，从而提升经济安全。

疫情期间，贸易和供应链对于增加包括疫苗在内的医疗物资的生产和分配至关重要。在俄乌战争期间，国际贸易作为韧性之源的作用再次显现出来。传统上依赖从俄乌两国进口的经济体，依靠深度且多元的国际粮食市场得以补偿短缺。例如，埃塞俄比亚无法再从乌克兰进口小麦，但目前其20%的小麦采购自阿根廷，而该国以前从未从阿根廷进口过任何小麦。

割裂的代价

在这一背景下，割裂对全球经济而言可能代价高昂。世贸组织的研究显示，如果世界分裂成两个独立的贸易集团，可能导致全球GDP下降5%。与此同时，IMF估计，贸易割裂造成的全球损失可能达到GDP的0.2%至7%。如果再考虑技术脱钩的情况，代价可能会更高。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将因失去知识转移机会而面临最大风险。

重要的是，应巩固贸易体系，维护已有成果，防止遭受损失。但令人欣慰的是，针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前瞻性贸易政策议程已经出现，按照这个议程，我们未来的国际贸易将具备包容、绿色、日益数字化和服务驱动的特质。

贸易在减少贫困和国家间不平等方面贡献很大。但我们必须承认，贸易已令很多人

失望——富裕国家的民众受到进口竞争的伤害，而贫困国家的民众则无法融入全球价值链，且在面临环境退化和资源争夺的影响时首当其冲。正如我们与世界银行共同撰写并向二十国集团官员提交的联合文件所述，我们本可不必如此。只要国内政策实施得当，各国就能够从自由贸易带来的巨大机遇中受益，且这可带动那些落后的国家共同发展。

比如如今所采取的贸易干预措施，解决引发不满的内在原因能更有效地解决人们的问题。以下这些措施均可以发挥作用：设计得当的社会安全网；加大培训投入；在信贷、住房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制定政策，帮助促进（而不是阻碍）劳动力实现跨行业、跨职业和跨企业流动。

当前推动供应链多元化的措施，为那些努力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和群体提供了巨大机遇：让更多的国家和群体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我们称之为“再全球化”），将有利于提高供给韧性、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

没有国际贸易，当今许多最紧迫的全球问题就无法解决。没有贸易，我们就无法应对气候危机并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我们需要贸易，它能将低碳技术和服务带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开放、可预见的贸易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以及边做边学降低脱碳成本。

例如，自2010年以来，太阳能的价格下降了近90%。世贸组织估计，通过贸易和跨境价值链部分实现的规模经济贡献了这一降幅的40%。

合作的可能性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更新全球贸易规则，促进贸易在新领域实现蓬勃发展、提供更多机会，这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如此。尽管货物贸易增长缓慢，但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迅速扩张的势头。2022年，通过视频通话提供咨询等数字服务的全球出口额达到3.8万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4%。

部分合作已在进行中。包括中国、欧盟和美国在内的近90个世贸组织成员目前正就数字贸易的基本规则进行谈判。达成一致的贸易规则将提高贸易的可预见性、减少重复工作，并降低合规成本（其通常对小企业造成的负担最重）。

同样，开展多边合作、制定共同标准可以加速绿色转型，同时防止市场割裂，并最



插图来自：IMF

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政策溢出效应。通过数字化等方式将更多小型企业和女性领导的企业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将让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从贸易中受益。

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仍有可能开展有意义的贸易合作。去年6月，我们就见证了这一点。当时，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国齐聚一堂，就遏制有害的渔业补贴、清除粮食援助障碍以及增加获得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达成了多项协议。在即将于2024年2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各国政府可以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在近期发表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一种方法，即通过数据分析以及在政策设计上达成共识来缓解补贴等敏感领域的紧张局面。

在当前的动荡时期，让各方制定妥善的贸易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保持贸易开放并寻求更密切合作的新机会，对于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多进步、助力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挑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IMF、世贸组织和其他主要国际机构在制定符合集体利益的前进道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必须不懈开展合作，巩固多边贸易体系，并证明我们这些机构能够快速变化的世界。IMF的一项任务是支持国际贸易的均衡增长。世贸组织仍然是将所有经济体凝聚在一起，推动贸易改革的唯一论坛。我们绝不能止步不前。FD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目前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 (NGOZI OKONJO-IWEALA)** 目前担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产业政策回潮

道格拉斯·欧文

发展中经济体是否应当效仿美中，
兴建国家龙头企业？

地

缘政治正在迅速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短短几十年前的政策环境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的改革时期，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开放市场，拥抱全球化。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建立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非歧视贸易体系。在这一时期，中国专注于经济增长，俄罗斯则疲于维持稳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暂未显形。

如今，政策制定者们则在争论全球化的未来。他们担心世界经济出现割裂，全球贸易规则成为一纸空谈。贸易干预正在增加，其形式包括产业政策和补贴，以国家安全和环境问题为由的进口限制，以及旨在惩罚地缘政治对手、确保国内供应的出口管制。

发展中经济体要如何应对这种新局面？它们是否应当采取类似的、内顾型的政策，通过补贴和贸易管制来保护关键产业？

关于发展中经济体是否应当参与世界经济，这一争论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许多观察者为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前景持悲观态度，担心它们的贸易条件会不断恶化。全球经济力量被认为加剧了不平等、将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推向落后的深渊。人们那时认为，需要出台进口替代政策，使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上更加自力更生，减少对其他市场的依赖。

误读历史

有关国家之所以实施内顾型政策，部分原因是对历史的某种特定解读。它们认为，富裕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保护了制造业——这种看法令产业政策受到了青睐。事实证明，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尽管关税很高，但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基于其开放经济体（移民开放、资本开放、技术开放）的定位，并且拥有体量巨大、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此外，19世纪末，征收高关税的美国通过提高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人均收入方面赶超了采取自由贸易的

英国。在西欧，经济增长与资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有关。旨在保护农业免受低价影响的贸易政策，可能是导致德国等国延迟发生这种转型的根源。

虽然全面的进口替代在几十年前已不再受青睐，但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又为它镀了一层金，但对于这个问题，标准的历史也可能具有误导性。1960年，韩元币值被高估，出口仅占GDP的1%。韩国的进口能力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援助。20世纪60年代早中期，货币贬值后，韩国的出口竞争力得到加强，呈现爆炸式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初出口已达到GDP的20%。其主要政策包括设定一个现实的汇率，为出口蓬勃发展创造机会，同时为所有出口商（而非目标产业）提供更低廉的信贷。直到1973至1979年的“重化工业大发展”运动期间，韩国的产业政策才真正兴起，而该运动因成本过高、效率低下而被最终叫停。但在产业政策时代之前，韩国已显露出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一直呈胶着状态。一些人认为它是生产率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推手，另一些人则认为其助长了腐败、降低了效率。一些人以阿根廷斥巨资在火地岛兴建电子产品组装厂为反例，但另一些人以中韩两国的高科技工业蒸蒸日上为正面教材。产业政策的效果很容易被夸大。定量模型表明，即使是最优化的产业政策，其带来的收益也很小，且不太可能带来重大变革。

最新情况是，继中国之后，美国也开始明确支持产业政策。中国这么做至少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主席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远离了邓小平及其后领导人秉持的外向型政策。包含大力补贴目标产业的“中国制造2025”纲领，已经让位于“双循环”理念，其注重通过加强本土企业的国内采购来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推动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保护钢铁和铝行业。通过《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美国对企业推



动半导体生产的“回流”提供补贴，并对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实行国别限制，以保障国内生产。欧盟一直有产业政策，其曾于2020年宣布过一项产业战略，在向绿色和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加强“开放战略自主权”。

发展中经济体要何去何从？是否应当效仿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新共识，通过政府补贴和贸易限制大力扶持特定本国产业？这项战略的风险很大。补贴可能所费不貲，但效益却不甚明朗。贸易限制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内向型保护主义，导致出口收入减少，对关键进口产品的购买也会相应减少。

大规模的产业补贴恐怕是富裕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美中欧能够负担补贴，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应当效仿。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的警告不无道理：“一味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却不问本国是否存在相应问题，或者只着眼于最近流行的问题，却意识不到它根本不重要，这些都是效率低下甚至祸国殃民的做法。”受财政困扰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财政收支不稳定、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切忌过度补贴国内生产。公共资金本就稀缺，若用于改善卫生和教育、帮助穷人，其效果要比直接投入国内产业更好。

产业补贴，进口替代

中国的例子说明了产业补贴消耗稀缺资源，效率低下。2006年，中国将造船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开始大规模生产，并通过低息贷款等措施给予投资补贴。有证据表明，这类政策不仅没有产生显著的效益，反而造成了浪费（由于产能过剩）和市场扭曲（迫使效率更高的国家进行相应调整，减少产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增长，以牺牲日韩欧的低成本生产商为代价，但其国内生产商并未获得可观的利润。由于低效率的生产商一窝蜂涌入，补贴被瓜分一空，引发产能过剩、产业割裂加剧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贷款极具政治色彩，获得大力

扶持的都是国有企业，而不是效率更高的私人企业。造船业并没有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也没有证据表明整个行业在实践中学习进步。

牺牲贸易收益

另外，转向贸易限制措施可能会导致发展中经济体损失一部分从世界市场中获得的收益。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取得经济进步，依靠的是投身全球经济，而非以刺激本土创新为由关闭市场。中国致富靠的不是产业政策，而是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进入制造业和释放私人部门的潜力。印度1991年的经济改革废除了扼杀私人企业的“许可证制度”的繁琐程序，开放了经济，这一举措至今仍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尽管改革还不够彻底。孟加拉国也因向外国开放投资而受益匪浅，大量资本与技术流入，令其人均收入超过了印度。无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越南，或者是其他国家，经济交往带来的利益都要超过经济孤立，因为它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技术和投资。

尽管贬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成为一种时尚，但改革时期的开放令全球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而非历史常态中的逐渐扩大。从1990年左右开始，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增长，逐渐向发达经济体的高收入水平看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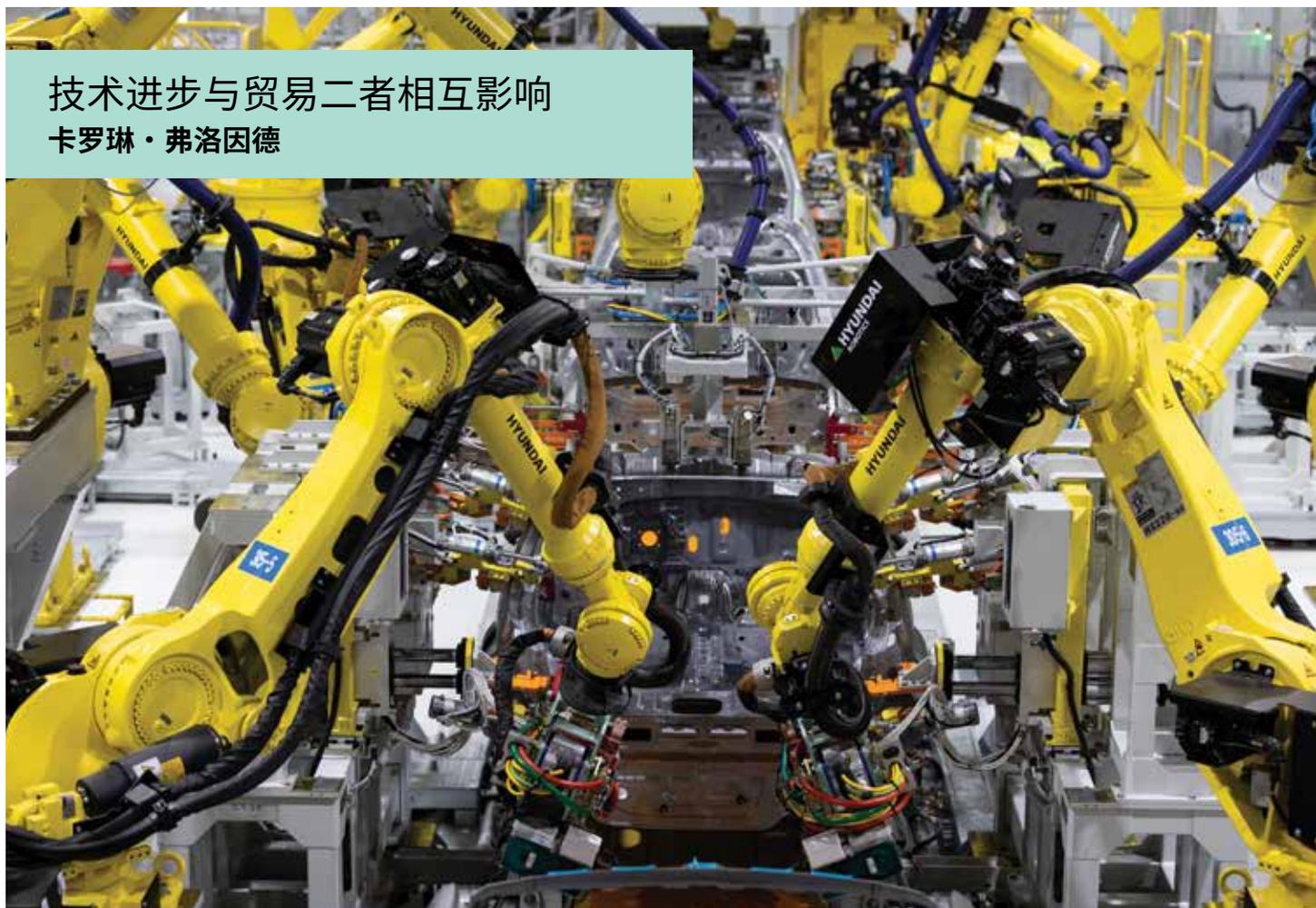
近期关于全球化是否已死的争论尚无定论。全球化未死，而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经济体若是背弃全球经济，放弃支持出口，不再从国外获取技术，那么这种做法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它们仍然可以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许多利益，但如果重回闭关锁国的状态，它们将面临很大的损失。FD

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是达特茅斯学院“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经济学教授，也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相交的轨迹

技术进步与贸易二者相互影响

卡罗琳·弗洛因德



技术变革令人既兴奋又恐惧——它使我们能够事半功倍，同时又让我们担心会被其取代。虽然技术变革会推动经济增长与进步，但被技术淘汰的群体可能会失去生计。

国际贸易的影响与之类似，但其产生的焦虑更多。这是因为对人们来说，国际贸易的好处不如创新那么明显；而国内劳动者因贸易造成的损失，会被与外国劳动者的收益直接联系起来。

当技术变革和国际贸易相结合时，其影响可能尤其强烈。这种组合加速了创新，加快了技术的采用，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它也可能成为造成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两极分化的一种力量。

地缘政治往往会使民众情绪进一步升温。随着各国在技术前沿开展竞争，贸易正成为这些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的重要转让渠道。国际贸易推动了技术的传播，加快了全球增长，但也带来了与外国对手分



享商业秘密的风险。

所有这些压力都会影响政策选择。在过去，贸易和技术对劳动者的影响使人们呼吁出台保护政策——但与贸易壁垒相比，加强社会安全网和帮助劳动者寻找新工作才是更好的长期战略。国际安全威胁引发了对产业政策和出口管制的呼声，但这些举措如果扭曲了国内的资源配置、刺激外国对战略产品的投资，则会产生反噬作用。

在一个割裂不断加剧、技术传播放缓的世界中，各国政府面临着刺激贸易、创新和增长的全新政策挑战。尽管创新者的目标可能是“快快行动并打破常规”，但政策制定者仍然必须保护现有制度，保持投资者的可预见性。

技术、贸易与发展

技术进步可以造就新的商品，如电动汽车；它可以带来新的工艺流程，如自动化和3D打印；它也可以创造新的运输方式，如集装箱和互联网即时数据传输。所有这些都会影响贸易，且往往会促进发展。

智能手机和平面电视等新产品的出现，使开展创新的国家能够取代翻盖手机和笨重的阴极管电视等过时产品的生产商。新商品会刺激更大的需求，使贸易整体趋于增加。

采用新工艺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实际价格，带动创新国家的生产和出口激增。发展中经济体往往专注于生产过程中可能实现自动化的简单环节，它们的一大担忧是其出口需求可能下降。然而研究表明，自动化的规模效应往往会导致对进口零部件的需求增加，即使其中一些最终由国内生产也是如此。例如，在汽车生产方面，发达经济体生产的机器人化与来自低收入国家进口零部件的增加同时发生了。

与运输技术的进步一样，电信创新在促进贸易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互联网使企业能够找到远在天边的新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它还开辟了新的贸易领

域，特别是在数字服务方面。

贸易还会通过创造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更庞大市场，来影响技术变革。能够进入全球市场的前沿企业可以扩大利润并投资研发，从而加快创新速度。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全球领导企业的竞争也会激励其努力维持在技术进步的最前沿。

贸易和技术对发展的总体影响是正向的，因为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并扩大了贸易。贸易还使新技术能够更快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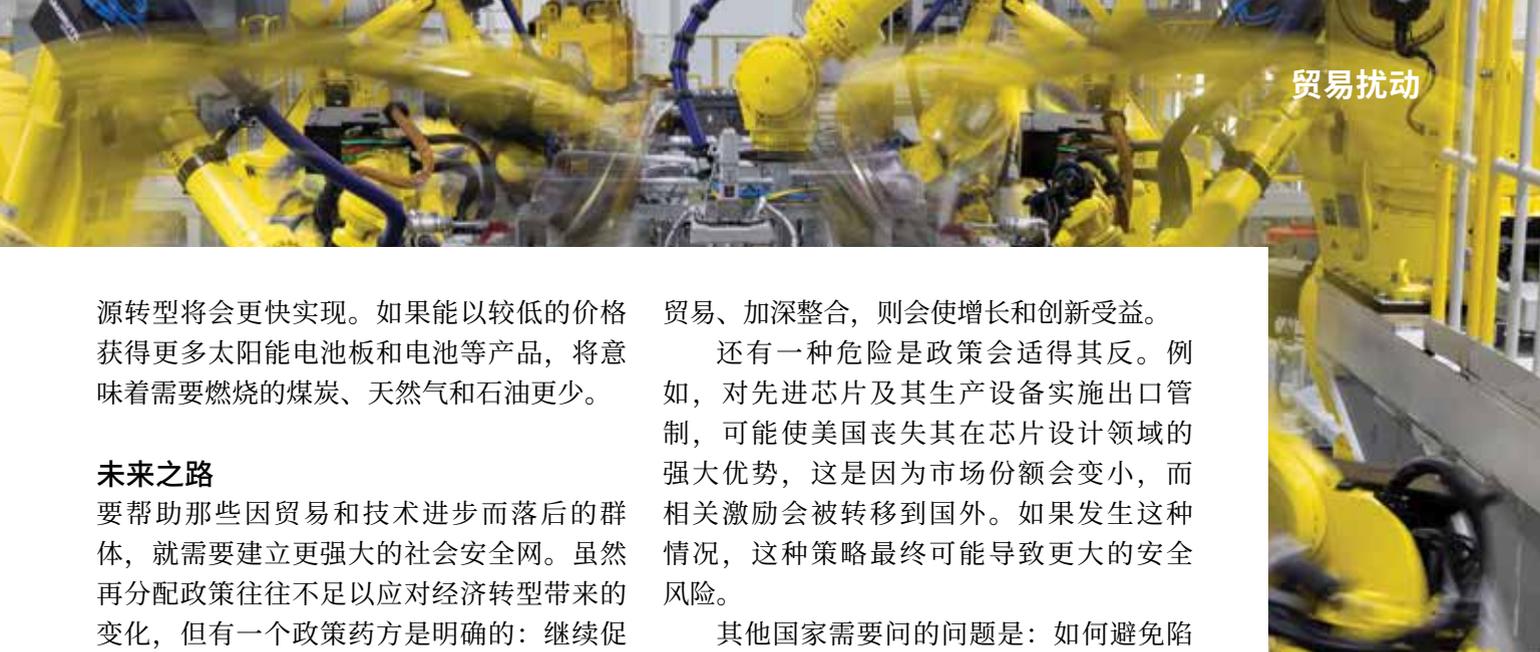
然而，技术进步和贸易都会造成赢家和输家，那些被锁定在过时技术中的群体会被抛在身后。因此，一些国家的某些行业可能会衰落，随着技术和贸易的发展，它们需要为失业人员提供支持。同样，由于政治、地理或基础设施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的国家，与全球领先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

政治反应

从过去来看，贸易壁垒经常被用来保护那些正在失去竞争力的行业。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更便宜、更优质的汽车和半导体，这使美国通过限制进口和促进出口来管理贸易。富国寻求保护知识产权，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其企业的专有技术和利润，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但近年来，对高科技产品使用的稀缺材料、制造设备，甚至高科技产品本身的出口管制，已成为减缓外国技术进步的一种有力工具。随着贸易和技术传播的放缓，这些政府干预刻意抑制了全球增长和创新。同时，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减少，既意味着利润增长的放缓，也造成了高科技产业研发投入资金的减少。

此外，新的贸易限制可能尤其不利于环境产品和绿色创新。如果我们能实现全球性的创新且推动价格迅速下降，那么可再生能



源转型将会更快实现。如果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多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产品，将意味着需要燃烧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更少。

未来之路

要帮助那些因贸易和技术进步而落后的群体，就需要建立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虽然再分配政策往往不足以应对经济转型带来的变化，但有一个政策药方是明确的：继续促进贸易和技术，将其收益用来支持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群体和地区。失业保险和再培训计划对于保持开放和自由的贸易至关重要。

未来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不危及本国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贸易和技术来应对我们当今面临的生存威胁。从在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中幸存下来，到适应、减缓气候变化——应对这些挑战的最重要工具，是寻找解决方案的创新活动，以及分享这些成果的国际贸易合作。但它们也带来了安全风险。

想一想贸易和技术在我们最近的经历中扮演了何种作用：新冠疫苗在创纪录的极短时间内被开发出来，并被运往全球（尽管疫苗的分配并不均衡），这得益于研究和生产方面的全球伙伴关系。半导体是所有电子设备与机械的基础，其主要在美国设计，很大程度在亚洲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离不开钴、锂和镍，这些矿物主要来自非洲和南美洲。

不幸的是，地缘政治正在影响新技术的创造和传播，对发展和气候行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并对越来越大比例的出口予以监管；中国也对此做出了类似的回应。这些关税正在减缓全球两大经济引擎的增长，并损害全球创新。

过激行为造成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其会对贸易和增长造成严重后果。与其采取宽泛的做法，如果政府仅对受技术威胁的产品进行保护，并与其信任的合作伙伴持续扩张

贸易、加深整合，则会使增长和创新受益。

还有一种危险是政策会适得其反。例如，对先进芯片及其生产设备实施出口管制，可能使美国丧失其在芯片设计领域的强大优势，这是因为市场份额会变小，而相关激励会被转移到国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种策略最终可能导致更大的安全风险。

其他国家需要问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陷入美中冲突。幸运的是，虽然存在安全风险，但标准经济学的大多数原则仍然成立。那些鼓励企业进入和扩张、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渠道的国家，将继续处于创新的前沿。开放的贸易和可预见的政策将继续推动资源流向最高效的用途。随着一些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坚持上述政策的国家将从中受益。

所有国家都必须避免被广泛开展国家干预的虚假吸引力所诱惑。中国过去30年的显著经济增长是由刺激私人企业的改革所推动的，而现在的增长正在放缓。几十年来，中国的私人部门一直都被低估了；而当前，公共部门引领增长的能力则被高估了。与其实施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不如保持可预见性、基于规则的体制、开放的贸易并提供资金，这样做才能使各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当前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趋势带来的最大危险，也许在于这种做法具有极大的传染性。历史一再表明，关税会引发报复，滋生更多的关税。同样，政府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的支持，也会使外国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导致他们游说寻求类似的支持。如果世界上的保护主义和补贴措施失去控制，将使我们在提高全球收入和应对紧迫挑战的道路上遭遇重大挫折。FD

卡罗琳·弗洛伊德 (CAROLINE FREUND)

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院长兼经济政策教授。



出口管制 带来的挑战

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获得帮助来应对不断增加的制裁与出口管制
查德·鲍恩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正在努力界定自己在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角色。目前，多边体系正在艰难应对贸易战和真实战争的影响。世贸组织能够帮助各国维持现状就已属万幸了，更不用说在短期内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

出口限制措施，包括禁令、管制和制裁等卷土重来，成为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尤其担忧的一个领域。在这方面，重大政策层出不穷，而它们的背景也十分新颖。这类政策有时会迫使一国采取额外行动，规避未来可能受到的限制，但其行动往往与世贸组织的其他规则相冲突。这种局面有可能引发恶性循环。

世贸组织应继续鼓励成员国限制使用出口限制措施，并在必须实施出售限制时保持其针对性和临时性。但世贸组织也需要离开自身的舒适圈，进入新的领域开展更多工作，对贸易体系中最脆弱的国家给予特别保护。

前车之鉴屡见不鲜

出口限制措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令人担忧的是，其严重性可能不断加剧。一些先例（它们由各式原因引发）可以说明世贸组织面临着重重困境。

为应对2007至2011年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多国限制了多种农产品出口。这导致世界价格进一步升高，粮食安全问题的加剧。在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的推动下，各方在政策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出台了农业市场信息系统（AMIS），以便更好地监测全球粮食库存。虽然农业出口限制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鉴于全球正在面临气候变化等冲击，全球粮食库存信息会降低不确定性，约束了之后各方推出农产品出口限制的自我循环，更是顶住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等多次压力。

在过去，中国曾通过各种政策限制原材料及其他关键生产要素的出口，有时是为了应对国内暂时的价格压力。这类限制措施将供应转移到国内市场，从而为中国的下游产业提供了隐性补贴，使它们在面对外国竞争对手时更具优势。尽管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曾承诺不限制出口，但它仍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在两

次正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中败诉，本应在2016年面临第三次争端解决，但此后美国彻底弃用争端解决机制。

2021年4月，印度突然禁止新冠疫苗出口。公共卫生方面的动机无可厚非——印度国内正在经历一波令人措手不及的感染浪潮。问题是，印度的生产设施得到了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内的外国实体的补贴，曾承诺向COVAX（即“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是旨在向数十个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的多边支付机制）出口数亿剂疫苗。出口中止致使COVAX陷入困境，而国际上本可用于支持其他地方加快疫苗生产的资金实际上被挪作他用。

世贸组织在约束各国使用出口限制措施方面的规则相对薄弱。

2022年，俄罗斯将天然气出口“武器化”。在入侵乌克兰的同时，俄罗斯停止通过其管道向欧洲输送能源，从而向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其他国家注意到这种不利影响，纷纷出台政策，减少从“关注国家”采购此类关键产品。迄今为止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决定提供歧视性税收抵免激励措施，试图将电动汽车电池生产要素的采购从俄罗斯和中国转移出去。鉴于这两国承担着目前的大部分生产，转移采购的成本极高。

最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经济体对高科技产品实行出口管制，理由是需要采取此类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这类措施有时是在事后实施的，例如在战争行为发生后出台的。例

如，许多国家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高科技产品，力图以此结束战争。但也有主动实施的出口管制。例如，日本、荷兰与美国达成协议，共同限制用于生产先进节点半导体的出口设备，作为对中国“军民融合”政策的回应。

规则薄弱，经验有限

世贸组织在约束各国使用出口限制措施方面的规则相对薄弱。

世贸组织可以总结过往经验来提供帮助。

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十一条明确写明不适用于“为防止或缓和输出缔约方的粮食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缺乏而临时实施的禁止出口或限制出口”的情况（着重部分由作者注明）。但其并未对“必需品”进行定义。此外，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国家安全例外，允许缔约国为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采取其认为必需采取的政策。

事实上，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多边贸易体系从未真正需要处理涉及出口管制、军事对抗和相关制裁的棘手问题。到中国（2001年）和俄罗斯（2012年）加入世贸组织时，这些问题已几近消失，直到现在又卷土重来。

那么，世贸组织要如何强化自身角色？

除了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政府如果缺乏信息，或是出于对市场短缺的担心，往往也会实施新的出口限制。因此，世贸组织应尽可能鼓励出台类似于AMIS的市场监督和透明度计划，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

若是涉及安全方面的考虑而采取政策行动，问题会更复杂一些。一些国家曾通过正式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此类行动提出抗议，但得到的法律裁决不仅形同虚设，反

而给本已紧张的多边体系火上浇油。因此，在最近向世贸组织提交的一份声明中，美国建议受到不利影响的贸易伙伴提起所谓的“非违反性诉讼”，而不必提起诉讼。

其想法是，当一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政策后，争议可立即提交仲裁，而其要做出让步以“重新平衡”贸易。其结果将遵循世贸组织的互惠原则——如果一国试图限制出口，就要预见到其贸易伙伴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这类反击措施有利于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其中牵扯的成本将直接构成额外的约束，从一开始就阻止一国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而过度采取出口限制措施。特别是，如果这种案件能够被很快提交仲裁（世贸组织正常的法律程序需要耗费数年之久），则会更加有效。

新的弱势群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一系列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应运而生，而这对“不结盟”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世贸组织要如何帮助能力受限的国家应对这一新局面？原则上，许多国家可能都希望保持中立。在实践中，其需采取措施，防止有关国家无意中犯错，招致二级制裁的惩罚。这个问题很复杂，分为三种情况。

首先，以粮食和化肥为例，俄罗斯是这两类产品的全球供应大国。将俄罗斯小麦踢出全球市场将损害全球粮食安全。从一开始，制裁国就试图表明，法律允许这类产品的贸易。包括这类产品在内的人道主义物资享受制裁豁免。

其次，是更加复杂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贸易。将俄罗斯能源供应踢出全球市场将导致价格上涨，给全球经济造成压力，因此七国集团制定了一项计划，允许各国在价格上限之内购买俄罗斯的此类产品。但这一流程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有购买意向的国家需要

获得更多的信息。价格上限可能需要调整。但能以这个价格（远低于从其他来源获得能源的价格）完成交易的国家，节省的差价相当可观，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这样做是值得的。

第三，其他军民两用货物，其贸易受到严格管控。以半导体等高科技生产部件为例，它们通常体型很小，可嵌入到其他物体中，亦可同时满足民用和军用目的（“军民两用”）。根据美国法律，美将某种出口管制产品运往第三国后，该国一般不可将该产品再出口到其他地方，比如出口至俄罗斯或俄军事供应商等特定最终用户。

然而，第三国企业往往受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参与套利并促成这类贸易。但若该国政府并不是非发起制裁的联盟成员，这些企业可能无法充分意识到参与这类交易的后果。

这些国家可能需要帮助，了解其权利和其要为自身选择做出的权衡取舍。例如，其政府很可能需要建立国内筛查机制，以防止国内企业再出口此类产品。另一方面，在没有法律顾问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也可能矫枉过正。不去开展合法的交易，也可能造成损失。

照顾最弱势群体

世贸组织可以总结过往经验来提供帮助。

首先，世贸组织一直通过《贸易便利化协定》减少官僚主义壁垒，支持经济贸易发展。同样地，其也可以与出入境官员合作，帮助成员国遵守制裁。因为遵守制裁——即使监管壁垒可能导致一些贸易中止——最终意味着能保持该国其他贸易的流动，因为这些贸易流动不会受到二级制裁的惩罚。

其次，关于公正性问题，可以向世贸组织的姊妹组织，世贸组织法律咨询中心（ACWL）寻求经验。ACWL向贫穷国家提供高额补贴的法律援助，帮助它们遵守世贸

组织规则。20多年来，其代表这些国家参与了数十项世贸组织的正式争端解决程序。

此外，ACWL还制定了治理规则，以解决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ACWL有一个制度，其中某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在一个案件中担任原告，同时在另一个案件中作为被告，而它仍可得到帮助。这样一来，ACWL不仅可以提供合理的法律建议，免受政治影响，有时甚至可以为政治政策立场不受欢迎的诉讼当事人提供帮助（类似于国内的公设辩护人必须担任被控犯有重罪客户的代理人）。

当然，就遵守制裁或出口管制提供法律援助补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但对于能力有限、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忽视这一问题只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在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制裁和出口管制不断增加，贸易环境也自然变得成本更高、涉及更多法律问题。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了维持贸易活动、支持自身经济发展，势必需要获得更多的法律建议。

其他情况

俄罗斯的情况很复杂，但这只是众多问题之一。在战争行为以外，其他问题可能更加复杂，例如为规避未来冲突而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想象一下类似问题，比如，一些国家的出口管制措施已经影响到向中国的出口。

以上这些都是目前全球大部分地区和世贸组织大部分成员国所面临的问题。世贸组织无法干涉各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政策。但是，它可以更加努力，帮助无辜的局外人继续保持中立，维护和推进全球化的成果。^{FD}

查德·鲍恩 (CHAD P. BOWN)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雷金纳德·琼斯” (Reginald Jones) 高级研究员。

绿色贸易的



紧张局势

绿色产业政策将推动脱碳，
但其会给贸易带来多少成本？

诺亚·考夫曼、萨加托姆·萨哈和克里斯托弗·巴塔耶

如果你认为贸易政策和气候政策的交集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少，那你就太天真了。

绿色产业政策再次受到当局的喜爱，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的保护主义条款，对于美国迄今最为重要的气候投资的通过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该法案中关于国内采购和最终组装的要求，拜登总统到2030年将美国排放量减少50至52%的承诺就将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同样也是这些保护主义条款，使美国的贸易伙伴深感沮丧，同时，这些条款也激进地扭曲了（甚至是完全违反了）世贸组织关于平等对待外国与本国供应商的国际贸易规则。

《通胀削减法案》出乎了美国亲密盟友的意料，而拜登政府正在努力缓解它们对该法的担忧。但这次的摩擦可能只是未来十年绿色贸易紧张的一个标志性开端。如果你认为贸易政策和气候政策的交集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少，那你就太天真了。

世界应该接受《通胀削减法案》和其他绿色产业政策——这些政策是实现《巴黎气候协定》有关承诺的实质性、持久性的措施。但它们也伴随着风险。就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它们应该建立保障措施，维护二战以来支撑全球繁荣的国际贸易规则。

国内政治，国际规则

类似美国这种将气候行动与产业政策结合的做法，并不只会发生一次。《通胀削减法案》背后的政治动机并非美国所独有。对于更多国家来说，要制定远大的气候政策而又不使其失去关键的国内支持，就需要同时使用补贴、关税和监管等手段，而现有的贸易规则是强烈反对（甚至禁止）这

些做法的。鉴于《通胀削减法案》对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预期拉动作用，其他国家也已纷纷予以效仿。

例如，欧洲对此采取的应对之策——也即“绿色新政产业计划”，以及旨在实现该计划的《净零产业法案》——与《通胀削减法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该法案将进一步放宽国家援助的规则（即欧盟关于允许国内补贴的相关规定），以涵盖更多类型的清洁能源项目。在新冠疫情开始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盟又再次放宽了国家支助的规则。欧洲的“绿色新政产业计划”也将包括各种融资措施，且会优先考虑劳动力培训，以便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实现欧洲劳动者的最大就业。

重要的是，欧洲还将通过所建议的欧洲主权基金（其将为产业政策动议提供资金）和创新基金（其将为创新示范项目提供资金）为国内制造业提供的补贴。“绿色新政产业计划”强调为各类清洁能源技术设立富有雄心的国内制造目标，包括风力涡轮机、太阳能光伏板、热泵、电池和电解槽等。

该计划反映了欧盟国家的一种合理关切，即担心其国内企业将迁往北美市场，以受益于《通胀削减法案》的慷慨补贴。这些担忧恰巧与能源价格走高同时出现——这种价格走高部分源于俄乌战争，其可能造成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和钢铁制造商安赛乐米塔尔等欧洲主要工业企业的萎缩。《通胀削减法案》使美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意味着将使其在新清洁能源领域迎来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但同时，其也可能造成数十亿美元从欧洲和其他地方（包括新兴市场）的清



洁制造领域中转移出去。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碳关税的斗争迫在眉睫。去年12月，欧盟最终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将欧盟碳价格扩大到进口的温室气体密集型产品。根据相关建议，欧盟最终将对包括美国和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未引入国内碳价格的广大国家征收关税。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虽然在设计上遵守了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但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地政策制定者的负面响应。美国提出了对进口品碳成分征收关税的提议（包括拜登政府的《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肯定也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愤怒，因为美国国内的生产商并不存在与之类似的费用。这些国家呼吁增加气候融资，包括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提供资金——这些提议在第二十七届联合

（Kristalina Georgieva）已经对这一趋势提出了警告，敦促有关国家“谨慎设计绿色补贴，避免浪费性的支出或造成贸易紧张局势，确保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技术。”

如果当前的保护主义势头持续下去，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封闭的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低成本的清洁技术很难实现跨境传播，全球脱碳将变得更加困难。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补贴大战的军备竞赛中能力有限，而这也将使上述情况进一步加剧。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各方在世贸组织提出大量针锋相对的诉讼案件，相互征收报复性关税，这将使全球清洁技术市场出现割裂，阻滞各方的气候行动。

促进绿色产业协调

能否实现更好的结果——也即相关政策（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以及欧盟的《净零产业法案》、碳排放交易计划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加速清洁领域的跨市场投资，而不造成贸易的割裂——将取决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伙伴如何制定它们的应对措施，以及美国和欧盟如何对其贸易伙伴的担忧予以回应。各方协调开展投资、加强供应链合作，可以让伙伴与盟友一起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鼓励各方推动气候行动。各方有必要开展谈判，就以气候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制定全面的规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带来的恶性循环——这些措施会增加集体成本或减缓脱碳步伐。冲突仍迫在眉睫，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希望的早期迹象——美国、日本和欧盟领导人正寻求妥协，而美国财政部对《通胀削减法案》的供应链规则进行了自由灵活的解释。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3月在华盛顿会晤时重申了他们承诺解决对方在《通胀削减法案》和碳边境调节机制方面的关切。

拜登政府理解其伙伴国对国内采购要求的关切，试图灵活实施《通胀削减法案》的某些规则，将“自由贸易协定”的定义扩大到了包括与日本（以及很可能即将与之签订协议的欧

如果当前的保护主义势头持续下去，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封闭的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低成本的清洁技术很难实现跨境传播。

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有了进展——只会进一步加剧愤怒。发展中经济体无法通过推出自身的补贴与发达经济体开展竞争；它们可能转而限制清洁能源技术的进口，并对原材料（特别是关键矿物）实施出口管制，以利用这些做法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努力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各方在绿色补贴和碳关税上的争议，可能预示着我们将在这个十年中面临横跨气候、贸易、产业政策领域的更棘手冲突。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盟)的关键矿产协定。尽管如此,本地成分要求只是若干争议之一。此外,达成一次性的关键矿产协议不应替代气候和贸易方面的全面协调——特别是,如果只有声音最响、最为富裕的国家才能获得让步时,则尤其如此。

有必要改革世贸组织等机构,并以气候俱乐部的形式达成更直接的协议——也许可从钢铁方面的协议入手。当前状态下,世贸组织能力严重不足,无法在以气候为重点的国家产业政策的益处与其对贸易关系的负面影响之间取得平衡。

首先,世贸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必须寻找方法让该机构与时俱进,不然,主要国家将完全忽视它的存在。也就是说,国际贸易规则必须为碳关税、有限度的绿色采购条款和类似的政策创造空间。若不实施这些政策,美国和欧盟就可能无法实现其目标。具体而言,世贸组织可以根据关于“一般例外”的第二十条(该条款概述了可能使世贸组织成员国免于国际贸易规则的情况),让各国国内的供应采购规则与清晰的环境规定保持一致,并重新努力达成一项全面的环境产品协议,降低清洁能源技术的贸易壁垒。第二十条是在距今近30年的1994年达成的,其中的环境条款模糊不清,与当前紧迫的全球气候危机相去甚远。世贸组织可以认定支持新兴创新技术的支出计划是政策工具包的合理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这些技术就可能无法实现商业化;如果不偏袒本土企业和国内就业,政府就可能无法进行如此大规模和高风险的投资。

可以肯定的是,与假设中符合成本效益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相比,将补贴与国内成分要求相结合,可能会提高脱碳成本——但前者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政治反弹,阻碍了政府的气候行动。鉴于碳预算不断减少,促使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是必要的,而这可能需要牺牲一些经济效率。

其次,七国集团——其于去年同意在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成立一个气候俱乐部——应该提供一个平台,促使各方达成协议、组建气候俱乐部,以支持排放密集

型重工业部门的深度脱碳。这些行业的产品(如钢铁)在同质的市场上销售——这些市场对绿色产品并不进行区分;这些产品受国际贸易的影响很大;且其相关设施和劳动力也往往集中于那些苦苦挣扎的地区。我们几乎不能避免推出补贴,以鼓励更清洁产品的商业化,以及为可识别的更清洁产品创造必要的市场。而且,上述工作还必须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优惠资金和技术援助,因为它们将在未来几十年推动排放量的增长——这在上述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与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与那些拥有廉价可再生能源潜力和关键矿物的经济体——开展合作,帮助它们从一开始就参与全球供应链,可以让它们在清洁能源技术制造的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这将避免未来的供应链对单个国家或地区形成依赖。七国集团的下一任轮值主席国意大利以及其他主要成员现在就应该开始制定一项满足各方需求的排放密集型产品贸易临时工作协议,且最好得到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参与。

推出新兴绿色产业政策是一个起点。政策制定者如今的抉择,将决定他们的最终轨迹。例如,《通胀削减法案》能否充分发挥其潜力,取决于若干要点,包括减轻对运输、劳动力和上游大宗商品投入品的限制。同样,《通胀削减法案》以及欧盟《净零产业法案》、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其他未来政策的全球影响,也将由国际上各方的反应状况而决定。经济竞争和各国的自身利益是气候行动的强大驱动力,但要发挥这种影响力,就需要各方保持克制、达到最低限度的合作。今天我们能否成功应对这种紧张局势,将决定这是一场良性竞赛,还是一场恶性循环。FD

诺亚·考夫曼 (NOAH KAUFMAN) 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学者;**萨加托姆·萨哈 (SAGATOM SAHA)** 是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学者;**克里斯托弗·巴塔耶 (CHRISTOPHER BATAILLE)** 是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

全球贸易的未来方向

现在是时候为实现可持续的未来重新构想全球贸易框架了

迈克尔·弗罗曼



照片来自：MICHAEL FROMAN

2013年，**当我成为**美国贸易代表时，我11岁的儿子要我解释我的这份新工作。就在前一年，他陪我去了趟印度。我们前往位于德里的一座优雅官邸，拜访了驻美大使。我儿子知道，由于我是一名贸易代表，所以人们也叫我“大使”，但我们却没有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入住一栋新的房子。他对此十分好奇。“贸易代表到底是做什么的？”他问。

我建议他去看看衣柜里衣服上的标签。墨西哥制造。孟加拉国制造。柬埔寨制造。我解释说：“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各国通过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或贸易优惠计划。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贸易。”

在此后的十年中，全球贸易经历了一些重大波折。过去，贸易协定和全球化带来了充满活力的高效供应链，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也降低了全球消费者的价格，因而其曾一度备受称赞。但在那之后，贸易协定和全球化遭受了一波急剧反弹，人们担心贸易自

由化和制造业离岸外包已经掏空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多国现在正在更多地推行本国主义政策。而这又导致人们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角色感到忧虑。

全球化正受到各方的严格审视，但它也在不断发展。人们关于“全球化已死”的谣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或其至少为时过早。一些国家的确退出了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但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仍在大步向前。企业正对它们的供应链进行评估——它们不仅关注效率，也关注其安全性、稳健性和冗余度。一些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产业转移到了国内，但近岸外包甚至友岸外包也不鲜见。全球贸易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体系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各种关切，比如气候政策和贸易政策相互融合，既可能加强国际合作，也可能造成新的裂痕。多边主义的局限性，以及就贸易问题达成全新政治共识的必要性，也是各方面面临的真正问题。

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相互融合

去年年底，我在埃及参加了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这场对话十分紧迫。各国政府、环保主义者、科学家、企业高管都十分关注如何应对全球变暖。

会议本身的成果不多，但回头来看，最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很可能要属主要经济体去年采取的单边措施，特别是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和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于去年8月得到通过，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气候立法之一。其涵盖了未来十年与气候相关的4000亿美元支出计划。在其众多内容中，

该法提供了7500美元的消费者税收抵免，用以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此外，它还还为美国制造商推出清洁技术和生产绿色能源提供了补贴。

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将于10月生效，其将对未建立类似碳定价机制的国家的制造商进口品征收“费用”——欧盟有意避免将之称为“关税”或“税收”。

《通胀削减法案》受到了美国的非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批判。它们认为，这些补贴具有歧视性，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外流。而这又致使欧盟提出了自己的一揽子清洁能源补贴计划。碳边境调整机制也引起了各方担忧。鉴于衡量排放量和比较各国碳定价机制的工作十分复杂，欧盟的单方面判断可能会被用于保护主义的目的，包括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保护主义。

气候政策和贸易政策在过去曾经较为独立，自成体系。但现在它们正在走向融合，有时甚至会相互冲突。主要经济体是相互合作还是各走各路，这尚不确定。

迈向开放诸边主义的趋势

世贸组织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短期内不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除了《贸易便利化协定》和《渔业补贴协定》这两个主要的多边协定，世贸组织在达成多边协定方面进展迟缓甚至无能为力。

虽然贸易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多边协议是贸易自由化的最高、最佳形式，但我们近几十年来的集体经验表明，对于主要经济体希望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得到什么，以及世贸组织应发挥何种作用，各方并没有达成政治上的共识。的确，如果没有达成底层政治共识，就很难实现机构改革。

各方对全球贸易体系的要求不断变化，且这些要求往往相互矛盾——现在需要的，是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就此开展实质性的对话。其应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经济效益、各国产业议程以及经济发展？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劳工和环境问题？在促进公平竞争、约束国有企业和权衡补贴方面，它应该发挥

什么作用？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是否应该是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以及建立一套执行这些规则的机制？

这些都是实现有意义的世贸组织改革之前，各方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民主、国内政治或公众舆论的现实，或是希望它们不会成为问题。民粹主义、本国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应由它们来决定满足各方需求的“最小公倍数”经济政策，但它们确实需要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在各方对全球贸易体系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世界仍在继续围绕这一体系运行，技术在不断进步，经济也在不断发展。现在，各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起来，制定相关标准，为更广泛的方法奠定基础。

以数字经济为例。与关税相比，数字化服务、数据、隐私、网络安全等（仅举几例）作用的问题，对许多经济体的影响可能要更大。

先前有关方面达成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定，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些最重要问题设定了一种较高的标准。同时，公共和私人部门现在也有机会开展合作，但也存在任一方采取单边行动、导致更大贸易摩擦的风险。

在各方难以就多边协议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开放的诸边主义（即在愿意超越最低共同标准、并愿意遵循新标准的国家之间开展谈判并达成协议）很可能是推进解决重大贸易问题的最有希望的方式。最近的一系列贸易协议，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都是如何向前推进的重要例子。

自十年前我儿子的衣橱之旅以来，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可能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但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事关重大，我们绝不能自满。FD

迈克尔·弗罗曼 (MICHAEL FROMAN) 是即将上任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是前美国贸易代表，也是万事达公司的副主席兼负责战略增长事务的总裁。

经济安全的 支柱



今天的供应链扰动再次凸显了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拉尔夫·奥萨

随着一系列危机（包括最近的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经济安全已成为各方政策讨论的一大重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寻找方法，降低它们对此类扰动的脆弱性——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带来全新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这方面，推动产业回流和友岸外包已成为各方青睐的政策药方，各方也在频频

讨论全球割裂的问题。

在本文中,我将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我会强调一个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强大多边贸易体系的好处。我认为,这样一种多边贸易体系是经济安全的最佳保证,因为它为受到供应短缺影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了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很难预测供应短缺将在哪里出现、谁有能力介入,因此,拥有广泛的外部选择是一大关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边贸易体系提供的这种“灵活性”在缓解供应短缺方面非常有效。埃塞俄比亚根据俄乌战争做出的调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世贸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俄乌战争对贸易影响的报告所强调,战前埃塞俄比亚从俄、乌两国进口的小麦占到其总量的45%,而在战争爆发后,来自两国的进口量急剧下降——来自俄罗斯的进口量下降了75%,而来自乌克兰的小麦进口量甚至下降了99.9%。但埃塞俄比亚通过大幅增加从美国和阿根廷进口的小麦,成功应对了这次扰动(尽管其先前并未从阿根廷进口过小麦)。显然,在一个相互割裂的世界经济中,在替代供应商之间实现这种迅速切换的难度要大得多。

全球供应链的现状

有证据表明,全球供应链目前相当集中。例如,只有少数美国企业的供应链是多元化的(这里指从一个以上的来源国进口同一种产品。参见Antràs、Fort和Tintelnot,2017年)。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世贸组织经济学家估计,全球出口中有19%是“瓶颈”产品——即供应商很少但市场份额很大的产品(Majune和Stolzenburg,待发布)。有趣的是,这一比例在过去二十年中翻了一番,表明全球供应链的多样性逐步降低了。

虽然人们很容易将这些事实解释为多样化不足的初步证据,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只是反映了在形成全球价值链时产生的巨大沉没成本。对于企业而言,寻找合适的外国供应商、协调生产流程和建立信任关系的成本很高,因

此他们被迫合理地安排全球采购战略。更重要的是,企业在避免供应链扰动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自身利益,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它们的业绩。麦肯锡估计,平均每十年,供应链扰动就会给企业造成年利润40%以上的损失。

全球供应链在中美贸易紧张下的缓慢调整,也说明了沉没成本的存在。诚然,正如查德·鲍恩(Chad Bown)最近所述,在一些风险敞口较大的产品中,可以看到初步的脱钩迹象。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持续征收了大量关税,但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在2022年仍创下历史新高。

在宏观经济层面,值得我们回顾的一点是国家层面的专业分工既是比较优势的自然结果,也是贸易收益的典型来源。事实上,我在其他地方也曾指出:贸易之所以是有益的,正是因为它为获取国内难寻的关键产品提供了一条途径——这基于以下计算结果:10%最关键产品占贸易收益90%的计算(Ossa,2015年)。这表明,要实现上述瓶颈产品的生产多样化,可能会带来高昂的福利成本。

世贸组织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全球经济分裂成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将平均使实际收入降低5.4%。而重振多边主义可以使实际收入增加3.2%——因此,放弃国际合作、转向地缘政治竞争的机会成本为8.6%。重要的是,各国的机会成本差异很大:发达经济体为6.4%,发展中经济体为10.2%,而最不发达国家为11.3%。低收入国家的风险最大,因为它们从与国际贸易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最多。

政策干预的理由

近期的一篇文章更正式地分析了应对潜在供应链扰动的政策干预理由(Grossman、Helpman和Lhuillier,2023年)。其作者指出,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政策失灵应予以纠正。一方面,企业有动力对供应链韧性投资不足,因为供应链扰动的部分成本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动力过度投资于供应链韧性,因为这可能使它们从供应链扰动中的超额利润机





会中受益。结论是：政策干预的理由十分微妙，且政府的愿望可能差异很大，如推动产业回流、离岸外包、放任不管或两者兼有。

若完全从实际角度出发，这意味着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政策干预的理由很薄弱。韧性虽然可取，但其代价也十分高昂。且目前尚无理由认为企业已经系统性地过少（或过多）暴露在供应链风险之下。即便如此，读者应认识到，本分析并未考虑到当前政策讨论中部分国家存在的安全考量。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也许并未将其商业活动的安全外部性内部化——而这可以证明那些有限度的、旨在将这些外部性内部化的全球供应链干预措施是合理的。

这些理论层面的考虑与现有证据大体一致。毕竟，在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期间，全球贸易一直呈现出巨大的韧性——同时，全球贸易也是韧性的重要来源。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贸易在经济衰退开始（即2020年第二季度）后的仅三个季度内便恢复了。贸易为家庭提供了应对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需的口罩、疫苗和居家办公设备。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后，贸易的表现仍高于预期——即便小麦等产品的贸易在起初出现了一定下滑。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避免了粮食短缺，即使是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这些风险敞口很大的国家也是如此。

一个强大的多边贸易体系的价值

以上这些考虑表明，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一个经济框架，让有韧性的供应链能够蓬勃发展。对此，最重要的莫过于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其将确保贸易壁垒处于较低水平，不具歧视性，且具有可预见性。值得记住的是，多边贸易体系是国际社会的一项历史性成就，它并不是国际商业政策的自然结果。它是在世界经历了去全球化的灾难性三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时刻被创建出来的。

多边贸易体系以规则为基础，它的这一性质对供应链安全尤为重要。它不仅降低了政策引发供应链扰动的风险，还提高了在最

需要获取替代供应来源时保持市场开放的可能性。而在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中，各国自由调整其认为合适的贸易政策，将使上述优势全部丧失。

从先前文献可知，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贸易流动造成巨大损害。例如，汉德利（Handley，2014年）指出，即使实际关税保持不变，承诺关税的降低也会增加贸易流量。这是因为，降低承诺关税会减少实际关税的变化幅度，从而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各国的实际关税有时会低于其在世贸组织的承诺关税，而这会导致所谓的“关税悬挂”。

更广泛而言，这意味着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信誉至关重要。重要的不仅是各国承诺了何种政策，也包括他人眼中这些承诺的可信度。这意味着任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行为都会带来重大的附带损害，破坏整个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世贸组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可信性方面的挑战，与央行在锚定通胀预期中的挑战并无二致。

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全球贸易的经济框架不能得到改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那么，世贸组织所谓的“再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指导原则。其理念在于努力实现更加包容的全球化，使更多国家能够参与全球价值链。FD

拉尔夫·奥萨（RALPH OSSA）是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 Antràs, Pol, Teresa C. Fort, and Felix Tintelnot. 2017. "The Margins of Global Sourc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9): 2514–64.
- Grossman, Gene M., Elhanan Helpman, and Hugo Lhuillier. 2023.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Should Policy Promote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or Reshoring?" Forthcoming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Handley, Kyle. 2014. "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1): 50–66.
- Majum, Sokrates K., and Victor Stolzenburg. Forthcoming. "Mapping Global Concentration in Trade Flow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va.
- Ossa, Ralph. 2015. "Why Trade Matters after Al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7 (2): 266–77.



歧视性区域 主义的兴起

在全球局势日益紧张之时，区域贸易联盟可能更多是一种歧视，而非一体化

米歇尔·鲁塔

30年来，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数量一直在增加，从1990年的近50项增加到了目前的350多项。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建立了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以便灵活推动经济一体化。其中一些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范围极广，合作伙伴遍及亚洲、澳洲和西半球。作为最新协定之一，2018年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范围横跨整个非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覆盖人口超过13亿。

区域贸易协定不仅改写了贸易规则，还在贸易和非贸易领域造成了影响。如今，其影响已经波及到了一系列政策领域，并在降低所有贸易伙伴（无论是否为成员国）贸易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多边一体化进程。除了贸易，区域主义浪潮还影响到了外国投资、技术创新、移民、劳动力和环境问题等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协定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却并非总是如此。

许多观察者指出，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一些人认为，全球紧张局势（包括保护主义和愈演愈烈的本国主义）正在削弱多边贸易体系，这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各国政府达成更多、更有力的区域协定。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应期待什么样的区域主义？区域主义兴起之时，正值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规则和争端裁决程序被广泛接受之际——那时的情况，与贸易关系破裂和世贸组织日渐衰弱的当前截然不同。

意大利有一句古老的谚语：“雅典哭的话，斯巴达也笑不出来。”在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是两大劲敌，人们认为如果其中一者失利，另一者肯定会胜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后，这两座城邦都开始衰败。如今，我们可以这么说：“多边主义哭的话，区域主义也笑不出来”。在冲突时期，区域主义不太可能摇旗称胜，反而其自身很可能被改变。在这之中，可能引发一种更具歧视性的区域主义，其目的在于抬高与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而不是降低与成

员国的贸易壁垒。这种类型的区域主义效率更低，最终也是脆弱的。

有深度、有活力的贸易协定

过去30年间，区域贸易协定已发生重大变化：其不仅数量更多，内容也变得“更深”。除了在欧共体的情况外，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贸易协定一般只涉及少数几个政策领域，并以关税自由化和边境问题（如海关）为主。

在此之后，这类协定（见图）将重点转向了深化经济一体化与合作（Mattoo、Rocha 和 Ruta，2020年）。现如今，它们还覆盖到了监管法规和所谓的非关税措施，而这些都曾是国内决策者的管辖范畴。尽管这些协定各不相同，但大致涉及三个相互重叠的政策领域：

- 货物、服务、生产要素市场，以及关税、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规则的一体化
- 限制政府阻挠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包括监管壁垒、卫生检疫措施、补贴和竞争规则
- 在劳工或环境标准等监管法规得不到遵守

时，对可能被市场一体化削弱的权利予以保护

加深一体化

过去30年间出台的各项区域贸易协定，为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们在推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这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尤为明显（Fernandes、Rocha 和 Ruta，2021年）。一项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进一步深化，推动成员国间贸易平均增长了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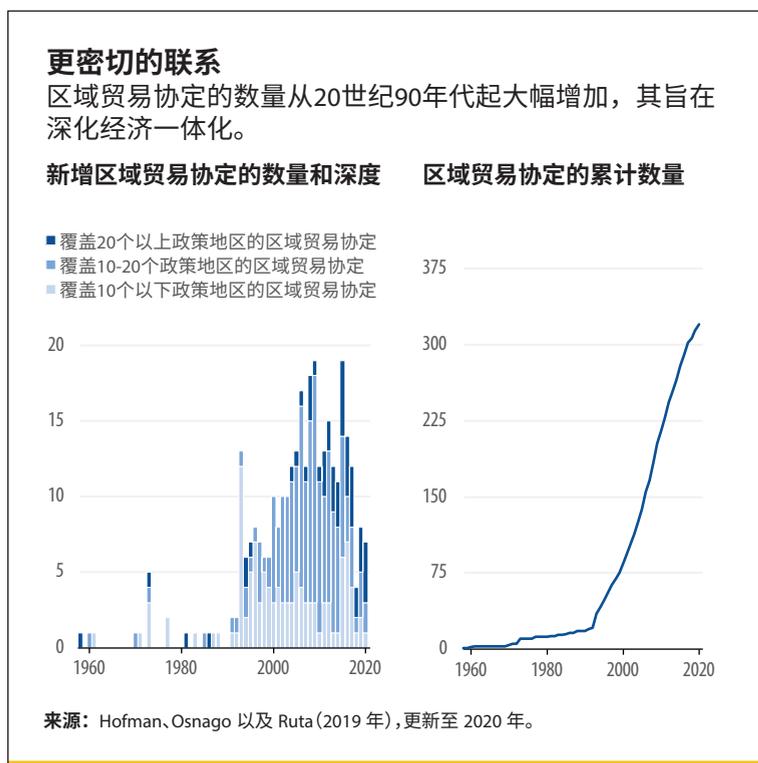
尽管有人担心这些协定会阻碍与非成员国的一体化，但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在最近出台的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条款都不存在歧视性，无论是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都能享受更低的成本。人们发现，旨在促进竞争、规范国内补贴或推动成员国市场采用国际监管标准的规则，也有助于促进非成员国的出口。

非贸易领域也受到了影响。事实证明，有关投资、签证和庇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既能降低跨境活动的成本也可降低法律的不确定性，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外国直接投资、移民和技术流动。一项关于区域贸易协定中环境条款有效性的研究发现，它们在2003至2014年保护了大约75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免遭砍伐。

但是，区域贸易协定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项有关童工标准的研究发现，未涉及童工条款的协定有助于减少雇佣童工并提高入学率。不可思议的是，禁止使用童工的区域贸易协定可能会适得其反：一方面它们会导致儿童工资减少，另一方面，贫困家庭不得不向劳动力市场输入更多儿童，以此弥补收入损失。

看不见的互补性

推进世贸组织谈判困难重重，无疑是近几十年来区域贸易协定一直在各方贸易议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但对其取得的成功，大多数人都没有重视的一个原因是：多边一





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在几个方面具有互补性。

首先，支持多边一体化的社会部门（如出口企业）也是区域一体化的拥护者。其次，世贸组织法律和争端解决机制构成了区域贸易协定的法律基础。许多此类协定都重申了各国对世贸组织的现有承诺，并依靠后者的裁决体系予以执行。其他区域贸易协定将多边承诺作为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基础。第三，许多区域贸易协定承诺都不是歧视性的，它们因此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和多边一体化。

这种互补性表明，区域主义在冲突时期可能会变得更加无力。虽然各国政府可能会将区域协定作为世贸组织规则的一种替代方案，或追求战略利益，但这并不一定会形成更具深度的区域贸易协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区域贸易协定法律是以更不稳定的世贸组织法律为基础；另一个原因是，反一体化势力（如进口竞争部门）会对区域一体化持怀疑态度，就像它们不相信多边一体化一样。

歧视性的区域主义

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在冲突时期，区域贸易协定可能会筑高围墙，以此抵御外部世界，而不是放低对内的围墙。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崩溃，针对区域集团以外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急剧增多，造成了贸易格局的洗牌。对英国来说，这一时期之初其从大英帝国内部进口的规模还不到总进口额的30%，而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该比率已超过了40%。在20世纪30年代，歧视性区域主义导致贸易变得更不安全、成本更高，人们也因此对它大加指责，称其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今天，与伙伴国加强联系却与非伙伴国渐行渐远的趋势，可能会再次引发区域性歧视。我们发现，保护主义措施正在激增，比如在补贴项目中提出本地成分要求，以及对非区域贸易伙伴国施以出口限制。此类歧视中的另一个例子是，严格要求建立产品原产地制度，目标是提高生产中本地区的价值成分，但却会以牺牲区域外价值成分为代价。这些做法

违背了多边贸易规则的精神（即便其不存在书面上的歧视性做法），可能会增加一体化的成本，降低贸易的效率。

歧视性区域主义也可被用来实现非贸易目标，比如提高劳工和环境标准、采用国内而非全球标准，或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重新调整供应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今年3月底，日本和美国达成了关键矿产协议，之后还可能新增一系列有限范围的新协议。该协议与过去30年间的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存在很大差异，不能很好地与当前的多边规则保持一致。

不确定的未来

冲突时期的区域主义肯定会保留一些过去此类协议的特征。区域贸易协定将能维持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状态，并继续尝试新的一体化模式。旨在减少市场割裂的深度贸易协定应受到欢迎和鼓励，特别是在非洲等有望从真正大洲级规模的市场获得巨大发展效益的区域。

但是，没有多边主义支撑的区域主义可能更容易受到去一体化强大力量的影响。区域贸易协定可能会逐渐被削弱并变得更具歧视性，降低对一体化的关注，转而为非成员国筑起保护主义壁垒。到头来，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根本没有选择，而在一体化和去一体化之间只有一种选择。在冲突时代，多边主义的复兴是对区域贸易协定的一种必要补充。FD

米歇尔·鲁塔 (MICHELE RUTA) 现任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对外政策处副处长。

参考文献：

Fernandes, Ana Margarida, Nadia Rocha, and Michele Ruta. 2021. *The Economics of Deep Trade Agreements*. Paris: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Hofmann, Claudia, Alberto Osnago, and Michele Ruta. 2019. "The Content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orld Trade Review* 18 (3): 365–98.

Mattoo, Aaditya, Nadia Rocha, and Michele Ruta. 2020. *Handbook of Deep Trade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地缘经济割裂的代价

贸易扰动对全球生活水平造成的损失可能与新冠疫情同样严重

马尔金·博尔赫斯、陈嘉骞和本杰明·凯特

去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除了战争直接造成的苦难和人道主义危机，全球经济亦遭受了这场战争的不利影响。乌克兰的生产活动因侵略而受到扰动，俄罗斯则受到了西方国家制裁，这使关键大宗商品的全球供应受阻。短短几天，能源、粮食和多种矿物的价格都冲破了历史高位。

俄乌战争导致全球贸易扰动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近年来，贸易限制措施在大宗商品和半导体行业（其被视为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的命脉）屡有发生，这种情况逐渐取代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共同利益。2016年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就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例。近年来，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相互设立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壁垒。另外，新冠疫情期间，多国限制了医疗用品和粮食的出口。尽管在整个20世纪，贸易壁垒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过去十年这一趋势已发生了逆转（图1）。这类事件可能是地缘经济割裂——即通过政策手段逆转以国际贸易为核

心的经济一体化——持续加剧的早期征兆。

贸易壁垒逐年增加，全球贸易一体化随之停滞。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年间，全球收入和国际贸易同步增长。对许多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它们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之有机会购买价格实惠的进口产品，进入广阔的出口市场以及获得外国技术——这成为了它们发展的关键推手。

贸易壁垒对生活水平产生了哪些影响？接下来做个简短说明。

假设某个国家开始对半导体征收进口关税。首先，对于电脑购买者而言，征收关税直接导致其支付的价格增长。当然，国内企业可以尝试引进与之竞争的类似产品，或扩大生产。但这种做法成本高昂——主要是因为，消费者在一段时间内的购买选择已经表明其对外国芯片存在偏好，无论是因其更低廉的价格还是产品特性。结果就是消费者变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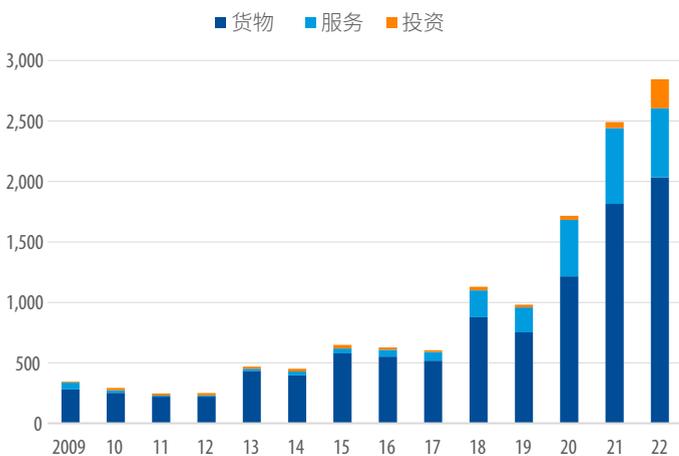
第二，从半导体出口国的制造工人的角度出发，出口市场缩水，工人收入势必下降。

图1

贸易限制措施大幅增加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贸易限制措施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近年来却又大幅增加。

(世界范围内每年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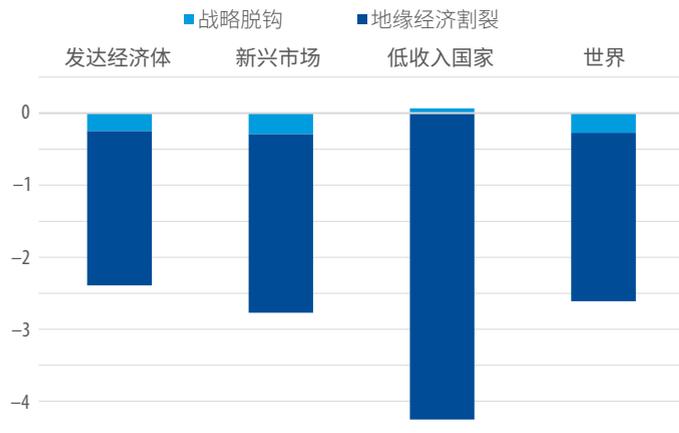
来源：《全球贸易预警报告》以及 IMF 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2

全球割裂的代价

若世界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容的贸易集团，将给全球GDP造成永久性损失，低收入国家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实际GDP的永久性损失，百分数)



来源：Bolhuis、Marijn A.、陈嘉寿和 Benjamin R. Kett (2023 年)。“全球贸易割裂：大宗商品的状况”，IMF 工作论文 2023/07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特区。

第三，一些商品和服务需要借助计算机作为生产要素，它们对价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在专业服务领域，会计公司可能需要向客户收取更高费用，以弥补其电脑价格的上涨。在复杂的供应链中，这类间接影响很多，其连锁反应还会波及其他国家的消费者。

总之，贸易壁垒增加，对家庭的打击是双重的。一方面，价格会上涨；另一方面，家庭收入会下降。

那么，地缘经济导致的贸易割裂有哪些潜在成本？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我们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

我们使用了一个多国国际贸易的定量模型分析了多个示意性的情景，以便模拟贸易壁垒变化对价格、贸易流量和收入的影响。考虑到大宗商品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和近期实施的限制措施，以及生产这些大宗商品的国家仅占全部国家的一小部分，我们构建了一个更详细地覆盖大宗商品的贸易和生产情况的数据集，作为模型的输入信息。

该数据集涵盖了145个国家的24个加总部门和136个细分的大宗商品，占全球GDP的99%。其他数据集将大宗商品归为一类，将黄金和天然气等不具备相似性的产品视为完全替代品。我们使用的这种方法可以捕捉不同大宗商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凸显出特定大宗商品的生 产往往集中在一小部分国家的事实。这两个因素都增加了贸易壁垒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地缘经济造成的贸易割裂状态下的产出损失。而这种割裂造成的总损失甚至很可能会更大。

首先来看第一个情景：贸易割裂仅限于俄罗斯与欧美之间停止一切贸易，以及中国与欧美之间中止一切高科技领域贸易。这种情况相当于将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扩大到所有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且将与中国的半导

体芯片战扩大到所有高科技产品。

这种战略性脱钩将导致全球GDP永久损失0.3%，大致相当于挪威的年产出（图2）。这种全球负面影响掩盖了各国遭受的不同影响。实际上，只要其他国家继续与俄、中、美、欧开展自由贸易，某些国家甚至可以从中小幅获利。例如，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收入会因此增加，甚至可能取代俄罗斯成为主要的供应方。如果半导体供应链撤出中国，一些亚洲国家将因此受益。

再来看一种更极端的情景，由于地缘经济割裂，所有国家必须被迫在美-欧、中-俄两大集团之间做出抉择，而这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切贸易都会中止。在这个示意性的情景中，对各国进行分组的标准是与美国或中国的贸易额。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产出将出现巨大损失，损失达全球GDP的2.3%，相当于法国的经济规模（图2）。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永久损失将在2%至3%之间。

低收入国家将面临巨大压力，损失超过其GDP的4%。债务危机的风险将随之加剧，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问题也会恶化。地缘经济割裂对贫穷国家的威胁最大，这是因为其严重依赖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关键产品的进出口，而寻找新的供应方需要花费更多成本。

这些损失与过去的事件相比如何？打个比方——在这种情况下全球GDP遭受的损失与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但前者是永久性的。

损失的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贸易限制的程度和国家集团的划分情况。调整过程本身就将十分艰难。如果割裂很快发生，供应链的调整需要付出高昂代价。全球GDP也将遭受更大损失。如果调整成本特别大，GDP损失至会高可达7%。

那么，包括最脆弱的经济体在内，可以

采取哪些措施避免割裂失控造成最严重的损失？近期发布的一份《IMF工作人员讨论文件》概述了在地缘政治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一些可能有助于降低贸易割裂风险与损害的国际合作模式。

为避免各国更多使用单边贸易壁垒，我们应强化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多边努力应侧重于有影响力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各国偏好的经济政策应该在大体上是一致的。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永久损失将在2%至3%之间。

但在当前环境下，通过多边协商一致取得进展并不一定可行。针对各国偏好并不一致的领域，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推进一体化，对其他国家采取开放和非歧视的立场，可能是一条行得通的道路。

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最易遭受割裂失控的不利影响，因此一定要避免被卷入争端。如有国家采取单边行动，则需要通过可靠的保护机制，保护弱势群体，缓解全球溢出效应。这类保护机制可包括建立粮食与药品安全走廊，以及旨在评估单边行动的经济影响、预测其意外后果的多边磋商等。

地缘经济割裂的趋势是全球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将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严峻影响。但是，通过加强全球贸易体系，促进其现代化，我们可以克服重重困难，维护经济一体化的累累硕果。FD

马尔金·博尔赫斯 (MARIJN A. BOLHUIS) 和本杰明·凯特 (BENJAMIN KETT) 是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经济学家。陈嘉骞是IMF研究部的副处长。

世界贸易的捍卫者

鲍勃·西米森 (Bob Simison) 对安妮·克鲁格 (Anne O. Krueger) 进行了采访，后者的研究帮助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但如今，这一贸易体系正受到威胁

当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与中国开展一场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贸易战时，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决定

表明其立场。在长达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克鲁格针对印度、韩国和土耳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让政策制定者深刻地认识到贸易在改善数百万人生活方面的重要性。但如今



图片来自：IMF/JOSHUA ROBERTS

这一切都受到了挑战。

为了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做出回应，克鲁格在2020年出版了一部300页的著作——《国际贸易：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事》，该书有力地论述了国际贸易如何惠及数十亿人，并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她在书中写道，“贸易保护措施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贸易造成的破坏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会越来越大。”

现年89岁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仍然在针砭时弊，强有力地回击席卷全球的保护主义浪潮。她将演讲活动日程排得很满，她笔耕不辍，还为世界著名线上论坛“报业辛迪加”撰写月度专栏，她最新发表的文章包括《美国的产业政策会适得其反》、《多边主义仍然是最优解》以及《梦游般陷入全球贸易战》。

克鲁格表示，“目前的情况令人沮丧，很快，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本人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但拜登政府却倾向于高度的保护主义，这会伤害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而这并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立场。在发达经济体中，全球化引发的失业问题导致了长达数十年的抗议活动。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崛起引发了各国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扰动促使各国采取行动，用区域贸易集团和“友岸外包”取代了全球供应链。

但克鲁格从不拘泥于传统观念。20世纪60年代，人们曾普遍认为，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通过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来保护本国企业。但根据她从土耳其企业直接收集到的数据来看，这些政策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她随后的研究彻底颠覆了经济发展理论。

2001至2006年期间，克鲁格曾是IMF的二号人物；再往前20年，还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她在明尼苏达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在她出版的众多书籍和研究论文中，有一篇被列入《美国经济评论》百年经典论文的“20佳论文”，这一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期刊由美国经济学会出版，克鲁格在1996年还担任过该学会的会长。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一直

提名她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以表彰其研究成果对贸易的广泛影响。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就曾表示：“安妮·克鲁格绝对是一位变革性人物。”20世纪90年代，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赖斯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而克鲁格在此管理着一家经济研究所，两人成为了工作同事、私人朋友，还会一起打高尔夫。“安妮总能把事情做好。她是一位顶尖学者，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方面，她都能能力超群，这一点十分罕见。其他经济学家对她的评价也都非常高。”

意外成为经济学家

根据克鲁格自己的说法，她成为经济学家其实是个意外。克鲁格在纽约州西部长大，之后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习。她学习的是法律，直到大四才学习了经济学专业。在201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著名经济学家的书中，克鲁格在自传简述部分表示，她选修经济学课程是“因为她认为一个人要想真正理解法律和政治，就必须学习经济学。”但克鲁格无力承担法学院的学费。之后，她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这就是我踏入经济学领域的缘由。”她在书中写道。

195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克鲁格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此后她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1982年前往世界银行工作。她后来写道，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对发展中经济体不利，因为它们在出口市场不具备竞争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且应直接开展投资或至少补贴国内制造业。

克鲁格如今表示：“我们都希望看到人们过得更好，尽力帮助穷人。”保护主义政策本想做到这一点，但没有奏效。她注意到，自从印度和中国开放对外贸易以来，全球贫困率大幅下降。

1965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任职时，克鲁格与土耳其几十位商人交谈，解释了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会导致走私和严重浪费。她写道，这些行为不胜枚举，例如“用船成批地‘出口’石头，再将其扔进海里（以获

得出口补贴)、对烟草等商品进行错误分级(烟草检查官接受农民贿赂后,夸大烟草质量),[以及]过剩囤积备件甚至整台机器,导致浪费”,以规避进口管制。

随后,克鲁格在1968年调查了印度50多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她写道,其中一些供应商向她提供了“三套账簿——一套给税务人员看,一套给公共投资人看,还有一套给管理人员看”。研究了土耳其和印度企业如何应对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后,克鲁格得出了一些结论,在此基础上,她撰写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该文于1974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

在该文中,她记录了贸易限制和进口许可证等政策对公共福利带来的成本,这些政策促使一些市场参与者依靠经济学家所称的“租金”牟利或直接收取“租金”。《美国经济评论》称该文是创刊百年发表的20篇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正是在该文的推动下,“大量关于腐败和治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文献”纷纷涌现。

《美国经济评论》称:“该文发现了寻租活动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个分析其中福利成本的框架,由此扩大了政府在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的经济分析范围。”其他有作品入选“20佳论文”的经济学家还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及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

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0世纪70年代,克鲁格与贾格迪什共同组织了一系列会议和研究,重点关注10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该项目针对每个研究国家分别推出了研究专著,贾格迪什和克鲁格还分别撰写了一本概览书。

克鲁格写道:“令参与者、甚至我们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该项目研究的10个国家均报告了许多同类现象。”研究表明,限制性进口政策的成本超过了收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取消了自己大部分的进口数量限制,而将目光投向

更现实的汇率政策,并大幅降低了关税。”

颠覆性的政策观点

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表示:“克鲁格将现实世界的经验与理论基础结合起来,展示了特定政策的扭曲成本和福利成本。”道格拉斯还表示,这些研究结果改变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贸易政策的看法。

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贸易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克鲁格写道,韩国政府引入更开放的贸易体系后,经济顺势腾飞,数百万人也因此受益。韩国的变化以及土耳其和印度类似举措带来的结果使克鲁格相信,开放的贸易政策会带来广泛收益。

克鲁格写道:“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资源也有利于更有效地解决环境等社会问题。随着人们摆脱贫困,他们对更好环境和其他公共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使政府可以更容易地解决这些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著名贸易专家阿文德·帕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表示,“克鲁格改变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思维,推动更多国家实现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她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数百万人摆脱贫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1982至1986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克鲁格调整了这家致力于减贫的全球性组织的政策,确保政策与她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她回忆道,世界银行1983年年报写道,她成功取消了该组织为国有旅游设施提供贷款的业务,并减少了该组织对农业投资的歧视。

2003年,克鲁格担任IMF第一副总裁后,她需要为首席经济学家这一空缺职位寻找人选。为此,她向认识多年的经济学家拉格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表达了意向。

拉詹表示,“我告诉克鲁格,我不懂宏观经济学,但克鲁格开玩笑地说,她也不懂。”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克鲁格认为IMF需要深入了解金融业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而拉詹的研究领域就是金融。

拉詹表示,“金融部门可能会让事态严

重恶化。危机出现时，政府会被迫救助金融部门，这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压力。”作为克鲁格手下的首席经济学家，拉詹帮助IMF提高了评估各国银行业稳定性的能力。拉詹后来还担任了印度央行行长，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应对债务危机

在IMF任职期间，克鲁格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提出了“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即“SDRM”，而该机制最后因政治原因被迫搁浅。但在过去二十年里，发展中经济体无力偿还债务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缺失确实影响了数百万人。

克鲁格在报业辛迪加2023年4月的专栏中写道：“穷人不应该为世界债权大国之间的分歧买单。”她提到了一年前发生在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她写道，由于斯里兰卡政府无法获得债务减免，因此无法购买粮食、燃料、药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国际社会应对主权债务紧急情况的程序亟需改进。”

克鲁格提议，在帮助资金短缺的债务国制定对债权人（包括私人金融机构等）公平的债务重组计划方面，IMF应发挥核心作用。SDRM将包含公司破产重组的特点，例如在债务重组期间保护债务人免受债权人的诉讼。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国际法律框架，能让多数债权人代表全部债权人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消除有人拒不同意的问題。

克鲁格在她2023年4月的专栏文章中指出，贫困国家获得的贷款，几乎有一半来自中国，但中国“拒绝像其他债权人一样减免贷款”，这对于解决斯里兰卡等国的危机构成了巨大阻碍。

最终，由于美国、英国和七国集团的反对，克鲁格的建议未能采纳。克鲁格在该项目中的高级助理马修·费舍尔（Matthew Fisher）表示，“人们并不希望让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国际组织【IMF】去干涉合同权利并实施贷款减计”。

相反，国际社会采用的是一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的做法，即将集体行动条款纳入政府债券条款中。这些条款给出了一项机制，即由多数债券持有人做出适用于所有债券持有人的决定。

IMF现任法律部总顾问罗达·威克斯-布朗（Rhoda Weeks-Brown）表示：“如果克鲁格没有努力推动SDRM计划，我们甚至都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当布朗参与该项目与克鲁格一起共事时，她还是IMF法律部的一位初级职员。“对IMF来说，SDRM是一项非同寻常且富有勇气的创举，克鲁格有远见也有能力领导该计划。”

克鲁格坚持认为，SDRM“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生效”，她的一些同事也这样认为。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肖恩·哈根（Sean Hagan）表示：“SDRM虽然被宣判了‘政治性死亡’，但它的思想意义依然还在。”肖恩当时在IMF法律部工作，后来担任IMF法律部总顾问。

克鲁格表示：“政府陷入困境是因为政策制定不当。所以我们需要像IMF这样的机构来审查政策，并指出哪些政策需要改变。”

“自然之力”

在克鲁格的职业生涯中，她已达到了偶像级地位，正如一些同事所说，她具备一种非凡的“自然之力”，是一位坚强、有毅力的人。然而，尽管克鲁格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有一个方面她不太愿意讨论。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詹表示，“作为一名女性，克鲁格突破了各种天花板，这可以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她如此优秀，以至于没有人会说她取得目前的成就是因为她是一名女性。她之所以取得现在的成就，是因为她太过优秀。她行事极为出色，且从不提及此事。她让其他人感到轻松。”

布朗认为，克鲁格是人们的灵感源泉和榜样。“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女性，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属不易，这也是她值得学习的地方。她是IMF首位女性第一副总裁。女性视她为榜样，因为她有先见之明、性格坚毅、行事高效。”

而克鲁格却说，她只是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FD

鲍勃·西米森（BOB SIMISON），自由撰稿人，曾就职于《华尔街日报》、《底特律新闻》以及彭博新闻社。



决策者和谈判者

韩国前贸易部长俞明希（Yoo Myung-hee）谈
韩国的崛起和在经济割裂中的风险

俞明希 参选世贸组织总干事时，她曾向成员国表示她出生的1967年恰逢韩国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当1995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被世贸组织取代时，她也在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回顾韩国从贫困和战争到全球贸易领导者的飞速发展，她将这归功于开放贸易。

作为韩国第一位女性贸易部长（2019-2021年），俞明希成功打入世贸组织总干事遴选的最后一轮，后输给了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Ngozi Okonjo-Iweala）。在政府任职近30年来，她参与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及与中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俞明希曾就读于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和首尔国立大学，目前是首尔国立大学国际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而她成长的家乡在韩国蔚山，也即现代汽车等全球贸易巨头产业的中心。

《金融与发展》：你是在蔚山长大的，这对你在贸易方面的认识有何影响？

俞明希：那里大型制造设施遍布，同时也聚集着全国各地的人才。得益于多边贸易体系，我们将蔚山制造出口到了世界各地。

不过，在我担任贸易专家时，多边贸易体系并不是吸引我的地方。虽然人们常对韩国的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津津乐道，但贸易也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1990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一位韩国农民来到日内瓦世贸组织总部大楼前试图自杀，以此抗议农业部门的市场开放。

因此，每当讨论进一步开放市场时，我们总会遇到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活动，这使得说服公众支持贸易倡议变得困难。这些才是激发我斗志的原因——贸易决策者和谈判者的工作充满挑战，协调内部分歧和各方利益的任务异常艰巨，同时还要努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

《金融与发展》：你是如何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实际谈判中的？

俞明希：做好充分准备和开展国内磋商正变得重要。首先，你要进行彻底分析，了解问题的实质。最重要的是，要与国内利益相关方和有关机构进行广泛磋商，这有助于你研究备选方案、确定着陆区域，在谈判期间调整自身红线。这么做也有利于今后方案获得顺利批准和成功实施。但是，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例如，在我担任首席谈判官与美国重新谈判时，由于农业相关人士的强烈抗议，我们不得不中止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而这是在韩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项法律要求。于是，我多次会见抗议者，在做好解释工作的同时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通过如此沟通，公开听证会才得以顺利进行，事实上我们一些人甚至还成了好朋友。就这样，我们在一年内完成了谈判并获得了国民议会的批准。

《金融与发展》：2007至2010年，你被派往北京担任韩国驻华参赞，这对你后来扮演

更重要角色（比如在与中国谈判中）有何帮助？

俞明希：当时的中国与现在不同，它正积极与其他国家展开接触，逐步开放市场。比如在2008年，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该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份自由贸易协定。

我积极与中国接触，参与完成了韩中自由贸易协定联合研究，努力推动扩大中韩贸易和投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在那以后，中国的政策和经贸格局都发生了变化。

《金融与发展》：你担任部长一年后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当时的情况又如何？

俞明希：作为贸易专家，我的大部分职业心血都献给了提升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人们普遍认为这能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及提高生活水平。

但作为贸易部长，我发现全球格局逐渐转向更加以安全为导向的做法。有人称之为“从基于规则的贸易治理”转向“以安全为导向的贸易治理”，其强调了供应链的韧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因此，2019至2021年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开始，经济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这种复杂环境我必须小心行事，在促进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同时增强供应链韧性。

尽管新冠疫情肆虐，包括韩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仍成功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实我们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在实质上达成了一致，然后就技术问题进行了一年谈判，待缩小差距后才签署该文件。我们通过视频会议取得了这一成果，实属不易。

《金融与发展》：你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对贸易的影响？

俞明希：鉴于大范围的供给扰动，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开始重新评估供应链的脆弱性及风险。

疫情首先是在中国暴发，导致韩国现代汽车无法从中国进口线束。这种手工产品工

艺简单，不像半导体那么复杂，但95%依靠从中国进口。疫情之下，中国工厂纷纷停产，现代汽车的蔚山工厂因线束供给中断而不得不暂停生产。后来，这家企业改从柬埔寨采购线束才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也正是在那一年启动了与柬埔寨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金融与发展》：全球经济是否面临着更大的割裂风险？韩国有多脆弱？

俞明希：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经济和贸易问题日益政治化，贸易方针开始以安全为导向，贸易政策与安全被融为一体。随着人们对国家安全以及美中地缘政治竞争的担忧日益加剧，全球许多国家和决策者都开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

这体现在各项政策中——比如供应链重构；在岸生产、产业回流或友岸外包等生产模式的推行；产业政策或大规模补贴的再度兴起；以及出口管制或投资审查。这些政策可能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持久影响，造成关键行业的割裂。正如IMF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所言，这可能会导致营商成本提高、企业进入全球市场受限、贸易不确定性增加，以及保护主义抬头和一系列争端。

尽管韩国一直在努力走开放贸易道路，但这种趋势也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供应链韧性和经济安全也是首尔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已采取措施来增强韧性，包括为发展关键产业、提升技术竞争力以及实现产业多元化提供支持。

此外，我们还在积极寻求通过双边、诸边和多边安排来加强国际合作，并认识到，增强供应链韧性并不一定要放弃经济开放，而是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

这种割裂趋势会延续到什么程度目前仍不明晰，但能确定的是未来的挑战依然巨大。因此，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必须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努力维护和促进开放贸易，同时在供应链的效率、韧性和安全之间取得适当平衡。FD

为控制篇幅和行文明晰，我们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辑。

超级大国正在 背离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正为强国政治让步，
这损害了发展中经济体

林奈莉

曾经建立并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各个大国，现在有了其他优先事项。这使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因此处境艰难。美、中两国正在改变整个体系，迫使其他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地缘战略对抗中选边站队。对这些国家而言，不结盟可能是最优策略——其目的不仅是保护自身利益，也是约束超级大国。

近期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一份报告强调了维护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开放贸易（与所有国家保护本国生产者和产品相反）是缓冲俄乌冲突不断上升的高昂成本的最佳措施。报告特别提到，尽管2022年爆发了战争，但全球贸易继续增长，全球供应链贸易也不例外

（2022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4%）。尽管专家（其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最初预测，战争将推高食品价格，致使数百万人陷入饥饿，但事实上，全球市场使价格稳定了下来（见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

问题是，大国正在背离由其自己创建的自由贸易体系。全球安全考虑以及国内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诉求，正让大国重新调它们的整优先事项。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全球贸易体系正逐渐被这些优先事项所影响。

国内就业和社会凝聚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化和开放贸易的批评在工业国家愈演愈烈，引发其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其核心观点是，贸易侵蚀了社会凝聚力。这种对贸易的抵触情绪被美国总



BUY MADE IN
AMERICA

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捕获并火上浇油，他以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国内就业和制造业为由，对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在内的美国最亲密盟友和贸易伙伴征收了关税。发展中经济体一直根据市场准入承诺制定经济战略，现在它们面临着被市场拒之门外的风险。

采取不结盟政策才能是这些国家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摆脱经济困境，以自身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为主开展国际关系。

打赢技术战：中、美两国正全力投入技术竞赛，争取领先地位。双方均视自由贸易为这场竞赛的不利因素。2015年，中国启动了依靠补贴和国有企业加快推进科技产业发展的十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而近期，美国推行以制裁、黑名单、进出口管制、投资限制措施、签证禁令和技术交易规则为手段的“技术本国主义”。2022年10月，美国出台了新的限制措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及其制造技术的能力，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能力设限。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美中技术脱钩的前景可能迫使它们必须在两个阵营之间做出抉择。各国在美国不断施压之下与中国技术制造商华为脱离关系，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供应安全：受新冠疫情影响，贸易和供应链遭受了扰动，供应安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友岸外包”作为一个新词进入了经济学领域，其旨在降低对潜在敌对供应商的依赖。世贸组织令人信服地指出，开放市场有利于保障供应安全，但主要大国却在背道而驰。2022年12月，加拿大及其盟友（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

宣布成立“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而七国集团正在制定一项投资倡议，用于保障关键矿产的安全供应。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不啻冷战政治重演。当时，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拥有战略资源的国家被两方阵营争相示好，经常引发严重的领导人治理问题。

有效的气候行动：美国和欧盟已推出一系列强势的产业政策、补贴和贸易限制措施，激励国内外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新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将投入4000亿美元，用于补贴可再生能源和达到北美零部件最低含量要求的电动汽车。这一法案已实现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流，并吸引宝马、梅赛德斯-奔驰、斯泰兰蒂斯和丰田等外国投资方。欧盟已启动《欧洲绿色协议》和碳边界调整机制（计划于2023年10月生效），向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就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此类倡议无异于“美国堡垒”和“欧盟堡垒”：富裕国家身为气体排放的最大元凶和气候威胁的最大责任方，正将其他国家阻挡在繁荣的大门之外。

应对侵略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愤怒的西方大国迅速制定出一套经济和贸易制裁方案。但许多国家并未加入。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各有苦衷，例如它们（在安全或粮食方面）依赖俄罗斯，制裁方案未能征求该国意见，或害怕此类制裁机制在未来对自身不利。

对小国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大国调整优先事项意味着全球不确定性增大。世界可能分裂成两个敌对的经济集团：世贸组织在近期研究中对此后果进行了模拟，预测某些地区的福利损失（也即实际收入的累积下降）高达12%，其中，低收入地区的损失最大。

已有证据表明美中经济正在脱钩（包括前述的技术脱钩）。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已从2016年的465亿美元峰值暴跌至2019年的48亿

美元。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以及中国政府大幅加强了资本流出的管制。尽管2022年中美贸易流量达到历史新高的6906亿美元，但近期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下降，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价值在美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也已下降。DHL快运公司和斯特恩商学院的一份近期报告表明，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跨境贸易流动并未出现大幅下降。对其他国家而言，脱钩的表现可能更缓慢、更有限。

如果美、中均寻求一种全新的实力平衡政治战略，两国都将要求其他国家明确立场以加强自身的实力。对处于对抗关系的超级大国而言，更多的“盟友”意味着它们拥有更可信的力量来制造（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威胁，且其也有更大可能成功实施威慑。但对其他国家而言，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对一些国家而言，结盟可能是有利的。冷战期间，西欧与美国结盟，在开放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中收获颇丰，而正是这一体系推动了战后重建、经济增长和民主发展。但对于那些因美国或苏联影响而遭受更严当局峻腐、制度压迫等问题的许多去殖民化国家而言，冷战的意義远不止于此

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更好的方法是以不结盟方式促进地区贸易、投资和生产，而不依赖超级大国的支持。新加坡的一位部长曾说：“选边站队将给我国安全和经济招致破坏性后果。”

全球贸易体系前景不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在贸易、投资、援助、武器采购和安全领域更希望多线布局。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仍然极度依赖从俄罗斯采购武器。另一些国家则需要俄罗斯的能源、粮食和化肥。因俄罗斯的非法入侵而加入对其制裁，将使各国付出沉重代价。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中国的援助、贸易和投资，也有很多国家目前正在寻求中国为其贷款提供纾困。它们也需要欧洲和北美市场。

采取不结盟政策才能是这些国家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摆脱经济困境，以自身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为主开展国际关系。新加坡秉持不结盟态度，1975年拒绝支持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1983年反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如今也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各国保持不结盟，便可以团结发声，敦促世界大国利用（乃至创建新型）多边进程和机构，帮助全球应对新的优先事项。小型和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发言权，还能限制大国做出损害小型经济体的行动。

目前，大国新的优先事项都是单边做出的。如果大国继续执泥于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牺牲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长期共同利益，那么其他国家就需要提醒大国，对其支持是有条件的——这取决于大国是否考虑它们的利益。

全球力量对比尚不稳定，美、中关系前景尚不清晰。双方对抗仍在升级。但两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较量不仅影响彼此实力，还关系着所有国家的未来。当前，其他国家应做好准备自力更生，坚持不结盟，确保两个超级大国的较量不会殃及其他国家。FD

林奈莉 (NGAIRE WOODS) 现任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 Aiyar, Shekhar, and others. 2023.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23/00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Bateman, Jon. 2022.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ashington, DC.
- Horn, Sebastian, Bradley C. Parks, Carmen M. Reinhart, and Christoph Trebesch. 2023. "China as an International Lender of Last Resor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038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Lardy, Nicholas R., and Tianlei Huang. 2020. "Despite the Rhetoric, US-China Financial Decoupling Is Not Happening." China Economic Watch, July 2.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23. "One Year of War in Ukraine: Assessing the Impact on Glob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Assessment note, Geneva.

贸易是推动性别 平等和发展的 驱动力

纳迪亚·罗恰和罗伯塔·皮尔玛蒂尼

国际贸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特别有利，
但只有坚定的政策行动才能获得回报



性

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经济要务。大量研究表明，让所有人（而非其中的一半）向社会贡献技能与劳动，可以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益。另外，男女同酬也是一种在经济上更为明智的做法。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推动性别平等的经济原因更有说服力，原因有二：这些经济体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更高，而缩小性别差距的潜在回报更大。

那么，发展中经济体要如何促进性别平等？国际贸易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我们的研究表明，贸易有潜力显著提升女性在经济中的作用，减少不平等，扩大女性获得技能和教育的机会。开放国际贸易的国家往往经济增长更快、创新更多、生产率更高，且能为人民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机会。

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性别差距、享受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女性机会带来的好处，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正在致力于深入了解性别平等与贸易之间的联系，以及贸易政策对男女的不同影响。但这方面研究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针对女性消费商品的类型、女性职业及其工作部门，缺乏按性别细分的数据。

贸易如何影响女性

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女性与贸易的报告试图填补这一知识空白。该报告以最新分析和按性别细分的最新数据为基础，旨在增进对贸易与性别平等之间双向关系的理解，并发现一系列可以令女性从贸易中获益的机会。该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确认贸易通过哪些渠道对作为劳动力（包括在家中和在工作中）、消费者和决策者的女性产生的影响。

报告证实，贸易通过多种形式使女性受益。

出口商雇佣的女性数量更多。在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的女性劳动力占比为33%，而在非出口企业中，这一比例仅为24%。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和有外国投资者的企业中，女性也具有类似的优势，与其他企业相比，这类企业平均多雇佣11%至12%的女性（图1）。

贸易令女性工资得到增长，有助于减少经济不平等。女性在总工资中的占比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出口企业支付的工资更高，另一方面是它们雇佣的女性数量更多。如果一国制造业出口额能翻一番，将使女性的工资占比平均从24%提高到约30%。在非洲，促进自由贸易有助于缩小工资差距，对熟练女性劳动力而言尤其如此。世界银行曾对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前景进行分析，模型显示，到2035年，熟练和非熟练女性劳动力的工资可能较基线水平会提高4%和3.7%，而所有技能水平的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将增长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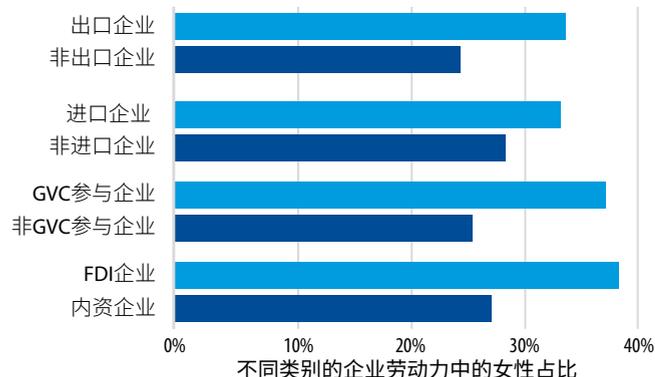
贸易为女性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工人如果在贸易量较大或与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更高的部门工作，就更有可能从事正式工作，从而获得更好的福利、培训和工作保障。女性受到的这种影响大于男性。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一体化程度更高的部门，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女性占13%，而在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部门，这一比例为20%。对于男性来说，在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部门从事非正式工作的概率为9.5%，而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概率下降到5.0%。

贸易开放令女性收入与消费双双增加。在我们所分析的54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在取消进口关税后，女户主家庭的平均实际收入与男户主家庭相比得到了提高。取消进口关税后，女户主家庭获得的实际收入增长平均比男户主家庭高出2.5%。在布基纳法索和喀麦隆等国，这一增

图1

贸易一体化的好处

在融入全球贸易的制造业企业中，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占比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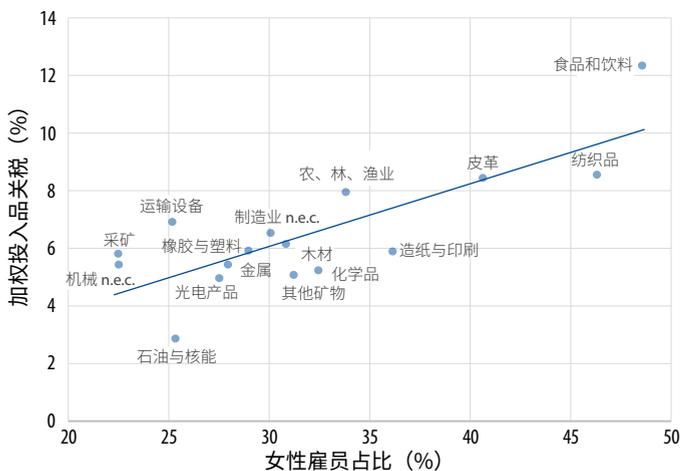


来源: Rocha, N. 和 D. Winkler (2019年)。“贸易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使用全球数据集的典型事实”, 政策研究论文 9098, 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注释: 该图显示了不同企业类别的加权平均值, 使用长期雇佣的劳动者的数量作为权重。出口企业是指出口份额 (直接或间接) 至少占总销售额 10% 的企业。进口企业是指进口投入至少占总投入 10% 的企业。全球价值链 (GVC) 参与企业是被同时归类为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 (FDI) 企业是指外国所有权占比至少为 10% 的企业。

图2

“粉色关税”

雇佣女性人数较多的行业面临着较高的投入品关税。



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2020年)。
 注释: 关税是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数据, 根据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ISIC) 两位数行业编码, 按照投入品的比例加权计算的, <http://www.wiod.org>。世界贸易组织综合数据库关税数据来自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 (WITS), <http://wits.worldbank.org>。
 n.e.c. = 制造未另行分类的机械和设备或此类设备的零件。

长相当于一年的教育或卫生支出。

因此, 开放贸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有利, 因为它拓展了女性所在的工作部门, 降低了女性消费品的价格, 并使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得以发展。贸易引起的竞争加剧也使歧视女性的代价更高, 从而缩小了工资差距, 改善了女性的工作条件。

贸易的好处

全球存在三大趋势, 让女性在21世纪的贸易中提升代表性并更好获利, 它们分别是: 服务贸易的扩大、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数字贸易的兴起。

全球经济活动正转向服务业, 而与农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相比, 服务业雇佣的女性比例更高。此外, 服务贸易的扩张速度比货物贸易更快, 为女性提供了更多贸易机会。目前, 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在三大产业中最多, 且在一国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可创造出就业机会 (Ghani和O’Connell, 2014年; Rodrik, 2016年)。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2000年, 46%的服务业劳动力是女性, 2020年这一比例升至58%左右。

全球价值链在整个经济领域为女性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 增加其收入机会。它们令女性经营的小微企业、小农场与国际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与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较低的部门工作的女性相比, 在全球价值链中工作的女性成为正式劳动力的概率高出10%。

数字服务的兴起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数字技术令女性能够摆脱资金、教育、流动能力和灵活性等种种制约因素。近年来,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平台都见证了女性所有的企业数量的激增。例如, 阿里巴巴平台上约一半的企业家是女性, 而纵观中国所有的企业家, 仅四分之一为女性。教育和卫生服务的在线贸易不断发展, 不仅增加了女性获得这些服务的机会, 也在女性较少受到歧视的部门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

再平衡政策

但仅凭上述趋势还不足以缩小性别差距。发展中经济体必须实施重大政策改革，帮助女性摆脱歧视。政策制定者需要调整不利于女性的关税政策。平均来看，女性密集型部门（如食品和饮料、纺织和服装部门）所需的原材料需要支付更多的关税（图2）。因此，女性生产者需为原材料支付更多费用，其出口品相较于男性也面临更多限制。在印度，这种“粉色关税”高达6个百分点（Mendoza、Nayyar和Piermartini，2018年）。

非关税措施，如产品标准和监管措施，对女性的影响也比男性大。由于这类措施的交易成本通常是固定的，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通常由女性所有）的负担更大。小型出口商也缺乏专门管理贸易流程的团队，并且由于它们不经常出口或仅小批量出口，繁琐的行政手续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对它们的影响尤其大。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障碍，比如获得贸易融资的机会有限，在边境更容易遭受勒索和人身骚扰等。

在关键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例如出台贸易政策，缩小关税方面的性别差距，或是简化跨境货物监管要求，促进贸易便利——即使不用明确针对女性，也可促进性别平等。通过政策让人们更好获得教育、财政资源、数字技术和信息的机会，也可帮助女性最大限度地从贸易中获益。这类政策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实现协调互补，以便为女性清除特定的障碍（例如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她们需要承担社会赋予其的额外任务，这就使她们受到时间和地域流动的限制）。

大流行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该报告提出的建议是政策制定者必备的指南，特别是在各国经济刚刚摆脱疫情困扰，正在逐渐复苏，又要应对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之际。2020年，新冠疫情令全球4.2%女性的就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减少了5400万个就业岗位），男性这一比例

则为3%（减少了6000万个就业岗位）。女性收入减少了8000亿美元，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从事非正规工作女性的工资损失，而女性从事非正规工作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疫情对更倾向雇佣女性的部门造成的冲击更大，并且由于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照顾责任，托儿中心和学校停课对她们的影响最大（Landivar等人，2020年），尽管远程工作缓解了这一负担。受疫情所迫，数字技术领域的投资增加，为女性在未来的贸易中受益创造了更多机会。

近期的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有可能使各方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付之东流。开放贸易是在经济复苏阶段促进性别包容必不可少的手段。

尽管贸易对女性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且贸易还有潜力提供更多机会，但随着比较优势的转移，与贸易相关的扰动会影响到一些部门和劳动力。互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获得新技能或迁移到就业机会正在改善的新地区。为了制定这类政策，各国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贸易对女性的影响。而这类分析又需要更多按性别细分的数据。FD

纳迪亚·罗恰（NADIA ROCHA）是世界银行宏观经济、贸易和投资全球实践局首席经济学家。**罗伯塔·皮尔玛蒂尼（ROBERTA PIERMARTINI）**是世贸组织贸易成本分析部负责人。

参考文献：

Ghani, E., and S. D. O'Connell. 2014. "Can Service Be a Growth Escalator in Low-Income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97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Landivar, L., L. Ruppanner, W. Scarborough, and C. Collins. 2020. "Early Signs Indicate That COVID-19 Is Exacerbat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Labor Force." *Socius* 6: 1–3.

Mendoza, A., G. Nayyar, and R. Piermartini. 2018. "Are the 'Poor' Getting Globalised?" In *Trade and Poverty Reduction: New Evidence of Impact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odrik, D. 2016.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1 (1): 1–33.

World Bank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Bank–WTO). 2020. *Women and Trade: The Role of Trade in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women_trade_pub2807_e.htm.

全球化的顶峰

贸易停滞不前、限制措施增加,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和思想的跨国自由流动,推动着经济一体化的前进。但是,全球化(即以上这些要素日益自由的跨国流动趋势)在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起起伏伏,且在近期似乎以达到了阶段性的顶峰。

人们使用“贸易开放度指数”——即所有经济体进出口总额与全球 GDP 之比——来衡量全球化。回顾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数据,全球化的几个主要阶段清晰可见。

如图所示,自 2008 年以来,全球范围的该指数已趋于平稳,而世界上一些最大经济体的相关指标已经下降。与此同时,过去几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大幅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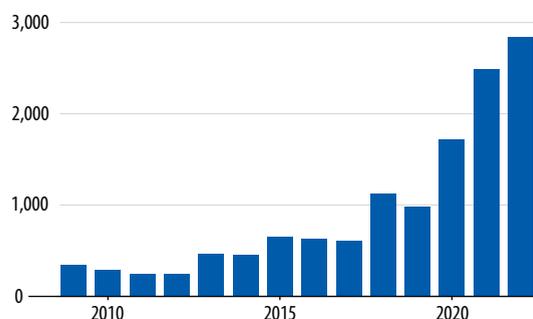
这些趋势对全球化的未来并不是一个好兆头。随着政策制定者努力理解、应对日益严峻的地缘经济割裂前景,这些趋势在今年已变得更加突出。

而在此之前,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已经加剧,而俄罗

斯入侵乌克兰导致了全球金融、食品和能源流动的严重破坏。此外,新冠疫情暴露了许多国家存在的脆弱性问题,使人们更加关注维护经济安全和提升供应链韧性。 **FD**

贸易限制措施增加

(全球每年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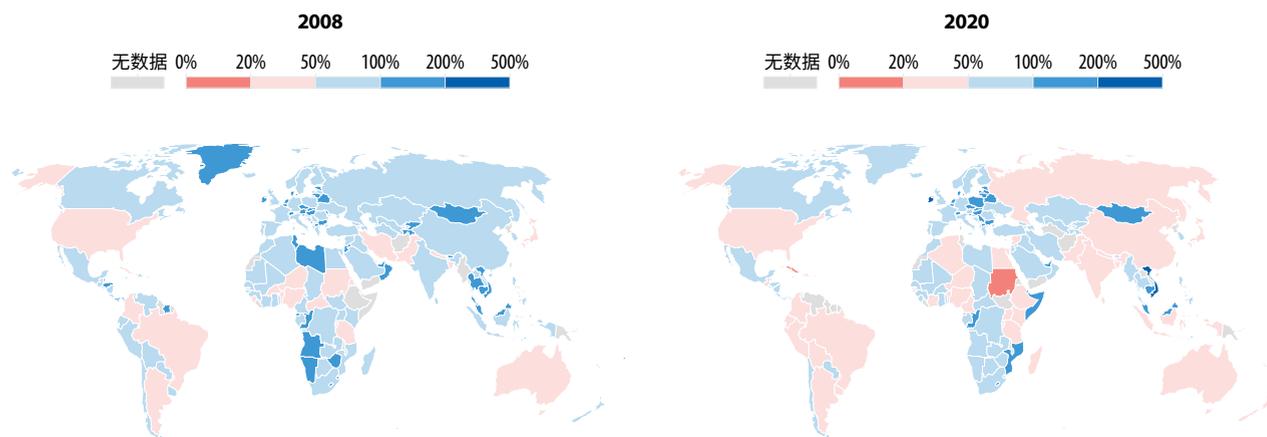
来源: 全球贸易预警网站。

注释: 包括对货物、投资和服务的限制措施。

安德鲁·斯坦利 (ANDREW STANLEY) 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贸易逆转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的贸易开放度都有所下降,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



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用数据看世界” (Our World in Data); 以及世界银行。

注释: 包括货物与服务。地图上显示的边界、颜色和任何其他信息,均不意味着 IMF 对任何领土法律地位的任何判断,也不表示对此类边界的认可或接受。

全球化的不同时期

全球化的历史由五个主要时期组成，它们在经济金融实力状况、国家之间经济金融联系的规则和机制上各有不同。

1870年至1914年：工业化时期

工业化时期是一个金本位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时期（该时期的全球贸易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和美国主导）。其主要由运输技术的进步推动，这种进步降低了贸易成本、增加了贸易量。

1914年至1945年：两次战争与保护主义时期

1914年至1945年：两次战争与保护主义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际冲突的爆发和保护主义的兴起，全球化经历了重大逆转。虽然国际联盟努力推行多边主义，但在各国建立贸易壁垒和金本位制瓦解为货币集团的情况下，贸易已呈现出区域化。

1945年至1980年：固定汇率时期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大国，美元随后与黄金挂钩，在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体系中起到支撑作用。战后的复苏和贸易自由化刺激了欧洲、日本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扩张，许多国家都放松了资本管制。但在社会和军费开支的驱动下，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最终导致该体系不可持续。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停止了美元兑换黄金，许多国家都转向了浮动汇率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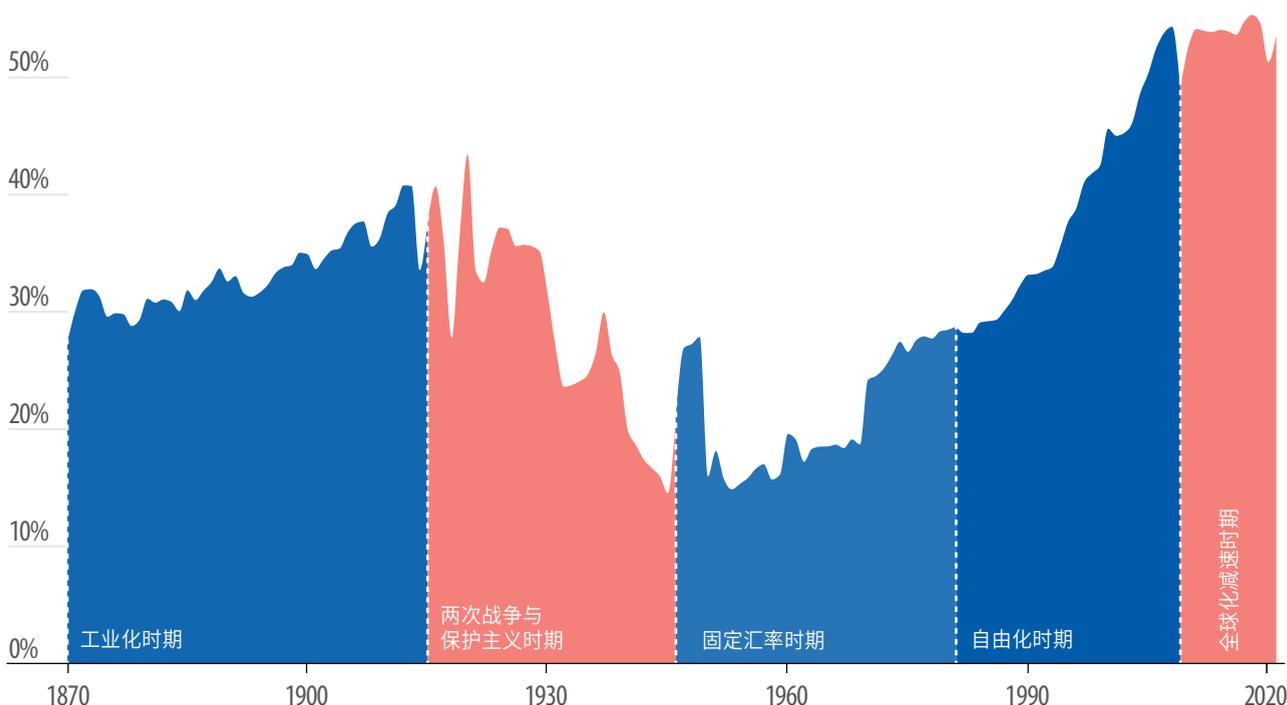
1980年至2008年：自由化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壁垒逐步消除，各国实现了空前的国际经济合作，包括前苏联国家的融入。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了贸易协定、谈判和争端解决的全新多边监督机构。跨境资本流动激增，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关联度。

2008年至2021年：全球化减速时期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入减速时期，其特点是贸易改革的速度长期放缓；伴随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各方对开放贸易的政治支持减弱。

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



来源：Jordà-Schularick-Taylor Macrohistory 数据库；Penn World Data 10.0 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世界银行；以及 IMF 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样本的构成随时间而变化。全球化时期的相关概念，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的研究为基础。

补贴大战

合作与共识可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

伊丽莎白·范·赫维伦



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经济体正在**加大补贴力度**，这导致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显著加剧。新的补贴、反补贴税以及诸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欧盟绿色新政产业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等立法，引发了人们对可能爆发补贴大战——即各方竞相补贴，导致一场逐底竞争——的担忧。

加剧这种担忧的是：一个主要贸易集团在采取补贴措施的仅仅六个月内，便促使其他贸易集团出台了各自的补贴措施。为了给事态降温、消解人们的担忧，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行为背后当局所担心的是什么，采取措施的目标又是什么。是什么驱使着政府为国内经济提供补贴？这些补贴会造成什么问题？如何防止补贴大战的全面爆发？

“补贴”是将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国内实体、而不需要后者提供回报的一种行为，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直接为国内企业提

供赠款，推出税收优惠，或为其提供有利的融资条款。政府使用补贴有多种原因，而补贴的条款取决于政府所希望达成的目标。

政府可能希望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或是在国际市场上建立竞争优势。想想航空航天和电信等高科技行业的生产补贴——这些补贴可用于实现可预见、有保障的供应链，或是维护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利益。

一些补贴缺乏清晰的理由，它们可能是游说或政治压力的结果。其他补贴则可能源于可理解的公共政策目标，如纠正市场失灵的需要，或是对国家紧急情况（如健康危机、气候变化）的回应。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政府对新冠疫苗的补贴——政府为解决产能限制问题而进行了干预。无论补贴的理由如何，如果其因设计缺陷而对别国产生了负面影响，则可能招致报复性的反制措施。

补贴有什么问题？

反对补贴的经典经济学观点是：补贴会导致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失调。补贴可能扭曲市场，降低经济效率，并将资源转移至低效的领域。如果补贴让一些企业受益、让其他企业受损，则可能会扼杀创新，迫使高效企业进行外包，或是完全退出市场。而这又会降低整体生产率。补贴还会创造寻租机会——“寻租”是指操纵经济资源分配的行为，其旨在为个人（而非整个社会）带来回报——并损害无力实施补贴的较小型经济体的利益。

补贴还可能支持那些有害公共利益、对环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做法。例如，IMF的经济学家表示，如果政策制定者同意以有效的碳定价取代化石燃料补贴，那么世界各国本可以将全球的碳排放量减少28%，让空气污染导致

的死亡人数减少46%。

但补贴对贸易关系的影响尤其令人担忧。首先，补贴会扭曲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决策。当补贴包含了歧视性的规定时，则尤其如此——例如，要求制造品的成分完全或主要由国内制造。例如，如果A国为成分全部为国内制造的产品的购买者提供税收抵免，则很可能造成许多的低效结果：制造商可能会重新配置供应链，优先考虑国内的合作伙伴；外国生产商可能会将生产转移到A国；A国的消费者可能会对国内生产的产品产生不必要的偏好。

第二，补贴损害了过去区域、多边协定中关税和市场准入谈判取得的好处。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补贴削弱了因下调关税而改善的市场准入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会增加人们关于贸易不公平的看法，并可能减少公众对贸易的支持。

第三，补贴可能让贸易伙伴认为该国政府助长了不公平竞争，可能迫使其做出同样的反应。更进一步讲，如果B国（A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认定其国内行业受到了进口的A国廉价产品（其得到了补贴）的不利影响，则B国可能会征收反补贴税，以此抵消补贴的影响。B国也可以补贴自己的产品生产，并采取与A国类似的措施。这些反制措施可能会使A国也实施类似的报复，导致补贴战不断升级。

国际规则能否提供帮助？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简称“SCM协定”）及其《农业协定》为货物贸易补贴的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例如，SCM协定界定了“补贴”的范围，其既包括应予禁止的补贴（如出口补贴和本地成分补贴），也包括了那些因对他国造成不利影响而可被挑战的补贴。该协议还要求各国政府将某些补贴向世贸组织进行通报，并为单边、多边救济措施建立相关程序，包括使用反补贴措施和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

但SCM协定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在目前世贸组织的定义中，某些形式的国家干预（包括对国企的补贴和由国企提供的补贴）并不会被自动认定为“补贴”。这种干预可能包括向生产出口商品的国企提供有利的土地或设备融资。一些国家对补贴规则如何适用于国有企业感到关切，并在最近的贸易协定中纳入了限制其扭曲市场行为的措施。这些协定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各国在引入补贴时，也时常没能通知世贸组织。这导致了透明度的缺失，播下了猜疑的种子。

不过，规则只是答案的一环。信息的缺失使政策制定者难以就使用补贴做出明智的决定。例如，它们不能对补贴及其影响开展全面的分析。在国际上，关于如何完善补贴以及尽可能减少负面跨境溢出效应，几乎没有相关的指引文件。没有这些信息，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工具就十分有限。

补贴大战能否停息？

当前的形势充满挑战。自2010年以来，世贸组织的补贴纠纷和反补贴税调查数量持续增加。随着政府补贴的扩大，主要国家之间针锋相对的竞争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但也许存在一条让我们转危为安的道路。最近，包括IMF在内的四个国际组织联合发表了题为“补贴、贸易和国际合作”的联合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来提高透明度、改善分析、加强合作，以改进补贴的设计，降低其不利影响。合作和共识将帮助大大缓和紧张局势，为全球贸易提供急需的开放性和可预见性。^[1]

伊丽莎白·范·赫维伦 (ELIZABETH VAN HEUVELEN) 是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的经济学家。



难民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

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菲利波·格兰迪（Filippo Grandi）认为，难民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超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范畴

金融稳定不仅涉及管理通货膨胀、就业率和支出，其也需要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不同地点、不同处境的人们。在接受《金融与发展》的布鲁斯·爱德华兹（Bruce Edwards）采访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讨论了人道主义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可如何为数百万流离失所之人提供支持，并为经济复苏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金融与发展》：全球难民问题的现状如何？过去十年中难民数量的激增应如何解释？

菲利波·格兰迪：难民人数的激增是非常明显的。十年前，包括难民在内，全球流离失所者的数量约为4000万。而现在，该数字已经达到了1.03亿，而且还在不断上升。我认为，这是我们当代世界在实现和平方面的一个重大失败。冲突数量大量增加，是民众流离失所的最大原因。当然，这还要在其他因素——经济因素、不平等状况、人口

形势、气候变化等——的更广泛背景下予以分析。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口的流动日益复杂。

我所在的联合国难民署有一个具体的任务，那就是为保护、帮助难民——也即逃离暴力、战乱或迫害的民众——寻找解决方案。对于各国国内的流离失所者——即在本国境内背井离乡，而未跨越国界的人们——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金融与发展》：在平日工作中，联合国难民署如何决定怎样分配自身的精力与资源？

菲利波·格兰迪：我们将专业知识提供给最有用的地方——这不仅包括典型情况下的难民（如乌克兰难民）和长期战乱造成的难民（如阿富汗和叙利亚难民），也包括因各种原因共同导致的人口流动的情况。例如，在世界许多地方，气候变化与冲突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已有的紧张形势，导致了更严重的流离失所——例如在非洲之角或萨赫勒地区，以及中美洲和南亚的部分地区。

我们不要忘记，民众流离失所，本身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想一想，当存在大量的人口流动时，与之相应的森林砍伐或水资源枯竭问题。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和IMF可帮助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应对民众流离失所的问题。

我们的组织在137个国家开展活动，拥有约两万名工作人员。我们与许多伙伴机构开展合作，包括当地部门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他联合国机构、开发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每年的支出约为60亿美元，其几乎完全由各方自愿出资。在一个资源竞争十分激烈的世界中，寻找融资十分艰难。我们希望通过与其他伙伴开展合作，满足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不仅包括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也包括开发性机构。

《金融与发展》：你们通常在多大程度上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菲利波·格兰迪：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合作领域。2018年，联合国制定了两项契约，即《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正如我所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过经常相互交织。联合国难民署是负责难民问题契约的机构，而该契约是各国处理难民问题的工具箱。该契约建议，今后，特别是在出现大规模难民的情况下，最好的响应不应仅仅是人道主义措施。在所有情况下，当局需要为背井离乡的大量民众提供食物、药品、住所和及时的照料。不过，当局很快就需要考虑中长期的需求——如教育问题、适当医疗、民众生计等。人道主义援助不特别适合在长期使用，因此，我们有动力与开发性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与世界银行一道推出了若干重要措施。几年前，世界银行在国际开发协会的平台上，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金融工具；此外，其也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金融工具，帮助他们收容大量难民。我们的目的是与世界银行一起努力，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如将难民纳入教育卫生体系，改善民众生计，改善经济机会，以及为收容难民的社区提供全面的支持等。

我们还与双边开发机构和其他地区银行开展合作。当然，IMF有所不同，这与其性质有关。但其正成长为该领域的重要对话方。为此，我们向IMF借调了一名工作人员，就其工作中涉及难民的问题，为IMF提供咨询。

《金融与发展》：联合国难民署的业务在全球经济趋势（如高通胀）前有多脆弱？

菲利波·格兰迪：有三个因素造成了我们的

脆弱性。第一，通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从安全后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在阿富汗和叙利亚西北部等地的运作成本十分高昂。第二，虽然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援助一直在增长，但其与需求的增长并不匹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随着经济压力和风险的增加，流离失所的民众——也即我们为之努力的对象——和收容它们的社区正变得更加脆弱，需要获得更多的帮助。在许多国家，大量难民涌入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影响。我们希望IMF在难民收容国的相关工作中考虑到这一点，并帮我们说明：难民融入社会，会为其经济与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金融与发展》：在环境极其艰难的国家，你们如何开展工作？

菲利波·格兰迪：我们帮助弱势群体，他们有时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例如，在当局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或领土（如阿富汗），或是在受到制裁的国家，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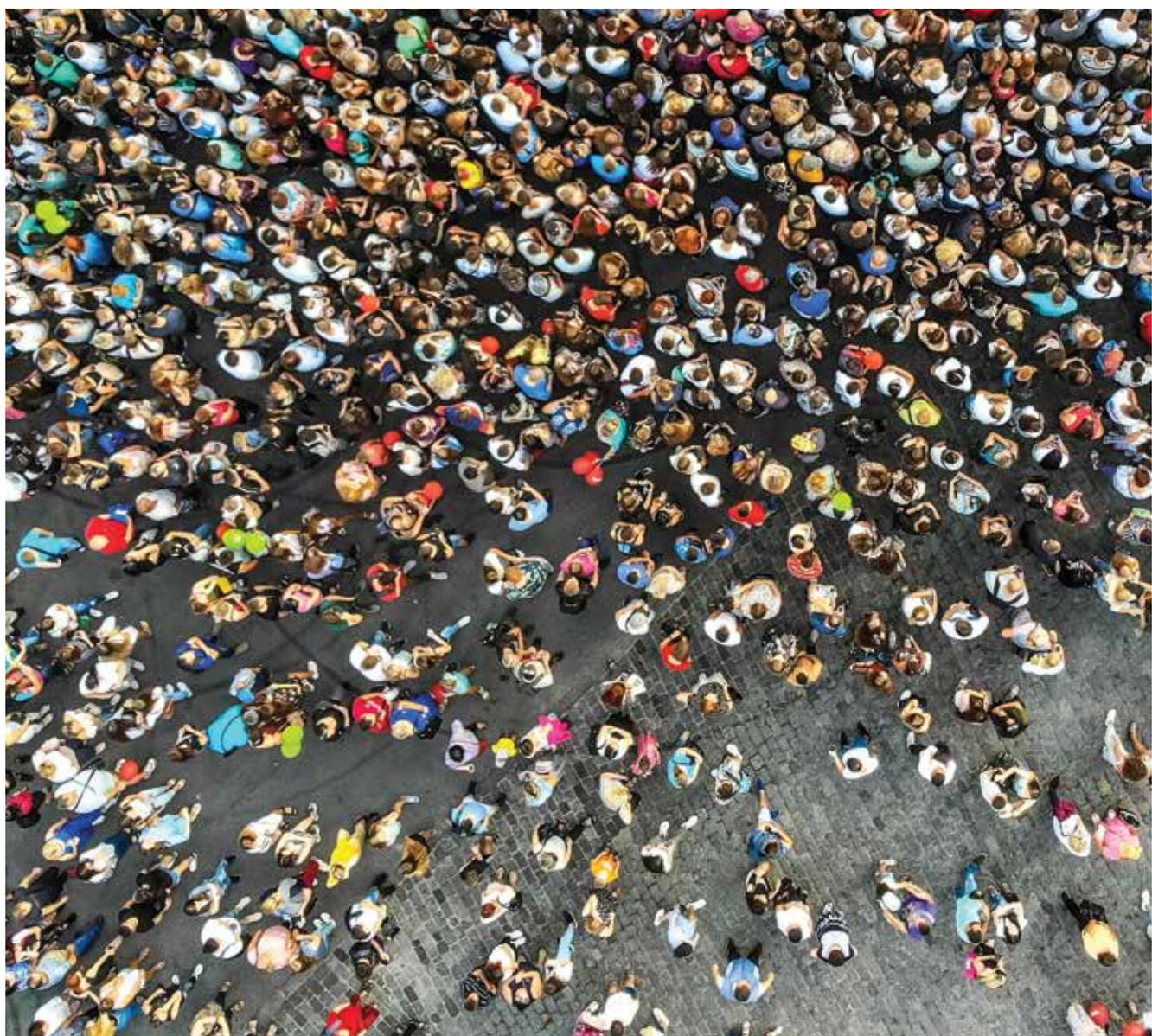
我们向利益方和捐助方明确表示的是：我们必须前往这些地方。我们在那里开展工作，不是为了承认或支持任何政府或机构。我们在那里帮助民众，这意味着需要与所有实体和政府开展工作，无论国际政治现状如何。有时，我们甚至很难实地获得资金资源，但有一些安排使之成为可能。例如，在阿富汗，适当豁免制裁使我们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为数百万民众提供它们赖以生存的人道主义行动。

《金融与发展》：您曾在世界上一些最艰难的地方工作过。你当初是怎么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的？

菲利波·格兰迪：我已经从事这项工作近40年了。当我刚开始在泰国做志愿者时，我还十分年轻。那时还是冷战时期，泰国是冷战前沿，存在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地的难民。我曾在一个非政府组织担任志愿者，这就是一切的开始。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我一直渴望从事国际工作，做一些对人们有益的事情；而我的一些理想和一些运气，让这两条个人道路走到了一起。FD

本次采访内容根据2023年3月23日的播客完成，我们出于文章篇幅和清晰表述方面的考虑，对文章进行了编辑。

老龄化—— 一颗真正的人口炸弹



图片来自：ADOBE STOCK/DMYTKRO

老龄化是全球人口的主要趋势；新冠疫情可教会我们如何为其做好准备

大卫·E. 布鲁姆和利奥·M. 扎克

2022年11月15日，世界总人口超过80亿大关。从70亿到80亿，我们只用了12年——这引发了人们对一些与人口快速增长相关的长期问题的担忧，包括粮食短缺、大规模失业、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急剧恶化等。

但在人口方面，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已经不再是人口的快速增长，而是人口的老龄化。深思熟虑，做好准备——包括引导人们改变行为，开展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政策、体制改革，鼓励技术创新——可以使各国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并充分利用人口变化带来的机遇。

全球人口爆炸的潜在威胁实际上已经被化解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然地消除了）。近几十年来，世界人口增速已明显放缓，且这一趋势预计还将持续下去（图1，第61页）。即使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2020至2040年的年均人口增速也仅为0.7%，低于0.8%的全球平均水平，且这仅为其2000至2020年水平的一半。联合国目前的预测还表明，人口逐年下降的国家将从2022年的41个增加到2050年的88个（包括中国）。

全球的主导趋势

在新冠疫情的头两年，全球与疫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死亡人数估计达到了1500万，这使全球预期寿命下降了近两年。即便如此，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口规模和增速仅产生了微

弱的影响（UNDESA，2022年）。新冠疫情加剧了不平等，且可能因“新冠长期后遗症”给经济带来了新的负担，但其对生育率的影响仍不确定。

各个国家、收入群体和地理区域的人口增速存在巨大的差异。低收入国家和非洲的人口增速极高，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和欧洲的人口增速则极低。一种趋势正在迅速普及，即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最普遍、最主要的人口趋势——这是由生育率下降、寿命延长以及大量人群进入老年阶段所致。

多年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图2（第61页）所示。全球预期寿命已从1913年的34岁飙升至2022年的72岁，而这一长期趋势预计还将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在1970年至2020年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生育率都下降了（Bloom，2020年）。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之初，15岁以下儿童比65岁及以上的老人多7倍；到2050年，两者的规模将大致相同。仅在2000年至2050年，全球8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预计将翻两番，达到近5%。

这些变化预示着未来几十年我们即将面临一系列巨大的健康、社会和经济挑战。这还预示着从现在看未来不太可能出现人口的普遍减少。为了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在生活方式行为、公共私人投资、体制政策改革、技术创新与应用等方面做出有意义的改变。不采取行动的潜在后果极其严峻，包括：劳动力减少，难以支持迅速增加的退

休人员；高龄疾病的发病率上升，相关医疗成本激增；人力、财力和机构资源不足，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下降。

人口方面的准备情况

与大流行病、国内和跨国冲突、技术变革等影响社会经济福祉的其他主要因素相比，人口变化通常是一个逐步演进而非突然变化的过程。人口趋势也更容易预测。鉴于此，关键利益方有相当多的机会来制定政策，鼓励人们改变行为来影响未来的人口形势，缓冲确实发生的人口变化的潜在不利影响。在人口准备方面，一些切实可行的目标包括：改善生殖健康；为人们提供相关的人力和实体资本，使其成为社会中具有生产力的一分子；确保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运作良好，使人们能够充分实现其生产潜力；建立相关制度和政策，减少人们对环境造成的负担；以及促进实现健康的老龄化。

在改变人们的行为方面，一项重要的变化是鼓励人们增加运动量。世卫组织呼吁，18至64岁的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的适度有氧运动；其还建议，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应每周三天从事运动，包括平衡训练和力量训练。然而，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未能达到这些标准（世卫组织，2020年）。此外，世卫组织还建议青少年每天从事60分钟的体育活动，但实际上，该群体有80%以上都没有满足这一标准。其建议的措施包括：推出政策支持步行或骑车出行，以及由学校、社区、单位、卫生系统、政府开展合作，提供更多激励措施和安全空间，鼓励青少年从事体育活动。其他措施，如鼓励更健康的饮食（低糖、低钠、低饱和脂肪、低热量的饮食），降低烟草吸食量，减少不安全的酒精摄入，也可为健康的老龄化做出显著且持久的贡献。

在高生育率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指标还不明显。尽管如此，这些国家肩负着应对高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任务。要应对生育率方面的挑战，需要以建设性的方式推动人们改变行为——其需要改善生殖健康、

满足家庭在计划生育方面的需求，同时降低高生育率社会有时会面临的沉重社会经济负担。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其从1950年的30%上升至如今的57%，几乎翻了一番——也将因计划生育而放缓增长，这将缓解相关的社会经济压力。

投资健康老龄化

自然而然的是，基础设施投资会聚焦于创造适于健康、关爱老人的活动空间上。在建设住宅和商业建筑时，可以重点确保建筑物有良好的通风，依靠清洁能源减少室内空气污染，避免对人们身心造成负面影响。在城市发展方面，实现公共交通电气化和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便利，是一项适当且高度优先的城市规划目标。

人力资本投资应关注维持人均经济增长，虽然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会下降。在理想情况下，加强技能培训项目不应仅专注于提高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的生产率，而是也应鼓励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如母亲和老年人）参与劳动。同样可取的做法是，对初等和中等教育开展投资，支持关键技能教学，尽可能专注于培养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创新者。

在体制和政策改革方面，可以让人们更好获得高质量的计划生育用品和服务，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退休年龄选择，鼓励个人为退休进行储蓄，激励各经济部门为老年人从业创造机会，发展、完善长期护理体系，促进疾病预防和早期发现。应放宽移民限制，这将让劳动力流向更加务实的领域，纠正工作岗位与劳动年龄人口的不匹配问题。例如，非洲寻找工作的年轻人过剩，而人口老龄化的欧洲则存在大量的工作空缺。

鉴于世界上仍有96%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其出生国，国际移民似乎有很大空间来缓解人口压力。移民的增多还可以增加外籍劳工的海外侨汇，从而支持本国经济发展——如果国际汇款的成本能够降低，则尤其如此。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汇款费用若能降低2%，则将为来自中低收入国

家的移民每年节省120亿美元（Ratha等人，2022年）。不过，国际移民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加剧“人才流失”，技术工人会前往海外寻求更高的工资。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方面，技术创新的潜力令人振奋。医疗技术（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和可穿戴的健康监测传感设备）、辅助设备（机器人）和信息技术（具有可交互性的电子病历和更多更好的人口层面数据，以了解老龄化情况并制定改善老龄化的政策）——这些领域的进步已经开始为健康老龄化做出贡献。鼓励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是在未来取得成功的一条光明之路。

与新冠疫情一样，人口老龄化及其挑战为社会的转型与振兴提供了一个机遇。最明显的一点经验是：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其他惨痛教训还包括：需要确定我们在保障社会最弱势群体方面的差距；让技术在连接居家办公人士方面发挥作用；对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开展评估，实现长期健康收益；以及重新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世界已经摆脱了人口爆炸的威胁，正在寻求避免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经验教训为在全球实现健康的老龄化提供了一条有益之路。FD

大卫·E. 布鲁姆 (DAVID E. BLOOM) 是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T. 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的克拉伦斯·詹姆斯·甘布尔 (Clarence James Gamble) 经济学和人口学教授；**利奥·M. 扎克 (LEO M. ZUCKER)** 是该学院的研究助理。

参考文献：

Bloom, D. E. 2020. "Population 2020."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57 (1).

Ratha D., E. J. Kim, S. Plaza, E. J. Riordan, and V. Chandra. 2022. "A War in a Pandemic: Implications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he COVID-19 crisis on Global Governance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Flow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36, KNOMAD—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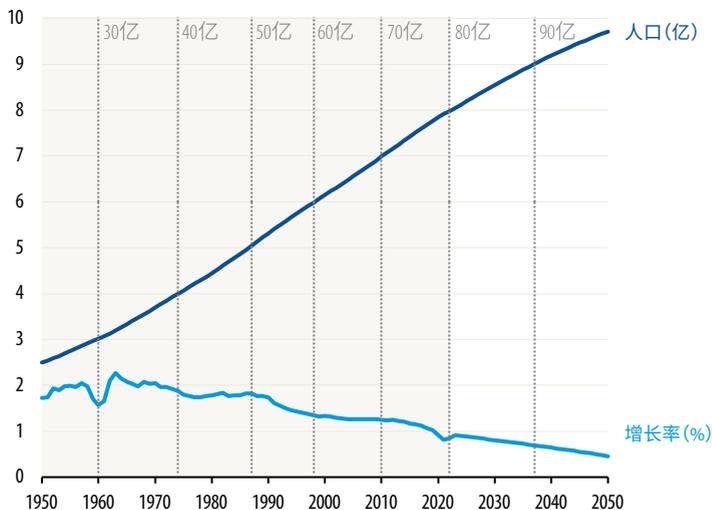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Summary of Results*. New York.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WHO Fact Sheet: Physical Activity." Geneva.

图1

人口繁荣逐渐消失

纵然全球人口已超80亿，但人口增长率却持续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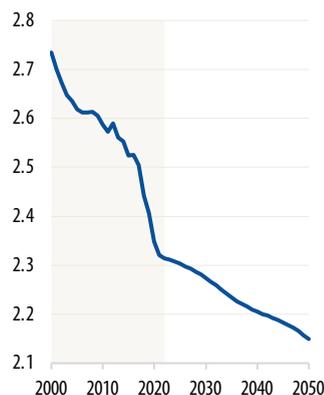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2年修订版）。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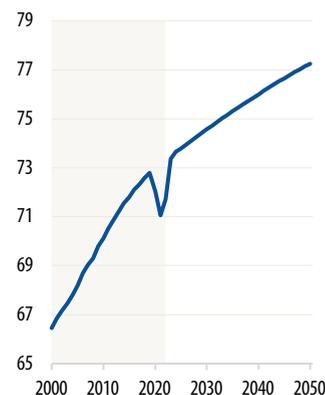
人口老龄化

人们的寿命有所延长，但子女逐渐减少，这导致人口中老年人口的占比上升。

世界范围内的总生育率
(每名女性的生育数量)



世界范围内的出生时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年数)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2年修订版）。

无风险的资本主义

美国政府决定承担硅谷银行无保险存款的损失，而这破坏了自由市场的纪律

拉古拉姆·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



图片来自: RAGHURAM RAJAN



图片来自: LUIGI ZINGALES

破产硅谷银行（SVB）的未保险储户是否需要得到救助？实施救助的理由是：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超过25万美元的存款得不到保险，但若未保险存款人遭受损失，恐慌将在银行体系蔓延开来。而大储户从其他银行争相提款，将会损害金融稳定。

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大储户总是因金融稳定的名义受到保护，那么为何不至少对其征收保险费用（这些费用给受保护保存者带来了负担）？企业的财务主管们有许多低成本的方法来降低银行交易账户资金的风险。他们可以只在活期存款（支票）账户中保留工资单和其他即时交易所需的金额，并将其他短期内需动用的现金存入高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基金中。然而，太多的企业未能实行基本的风险管理。据路透社报道，流媒体设备制造商Roku在硅谷银行的存款超过4.5亿美元。硅谷银行的股东理所当然地承受了损失，其管理层也被解聘，但政府改变规则使大储户们受益——他们享受了“无风险的资本主义”。

而当局本可对大储户的资金实施减计处理。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过去的干预措施，这将使未投保储户承受其存款余额10%左右的损失。一些面红耳赤的企业财务主管将受到应有惩罚，丢掉饭碗。此外，如果有迹象显示风险向其他银行蔓延，政府原本可以宣布对所有存款提供全面的隐性担保——正如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最终所做的那样。即便如此，FDIC也可节省200亿美元，并（至少部分）保留由冒险者承担后果的原则。如果能这么做，硅谷银行的处理方式将会被视为资本主义对无能者的惩罚，而不是一种对常规的违反——这种违反开创了一个先例，可能引发人们更多去尝试“无风险的资本主义”。

更一般而言，正如美联储自己的调查所

如果政府反复表明其有意施以援手,那么当它表示下一次将不再这么做时,它将毫不可信。

指出,硅谷银行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该银行犯了教科书般管理不善的错误”。如果是这样,不稳定的未保险活期存款可能是体系中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错误。如果未保险储户能够密切关注银行态势,他们就可以迅速解聘无能或贪婪的银行管理人员,从而为纳税人节省巨额资金。如果他们被监管机构所说的“现在不是担心道德风险的时候”的陈旧论点而麻醉,那么未保险储户未来就不会对此予以关注了。如果政府反复表明其有意施以援手,那么当它表示下一次将不再这么做时,它将毫不可信。

政府是在大量的游说之后做出这一决定的,包括风险资本家们哭天抢地、寻求帮助。Craft Ventures公司的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在推特上写道:“我要求银行监管机构确保系统的完整性。美国的存款要么是安全的,要么不安全。”亿万富翁对冲基金巨头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推特上写道:“如果私人资本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政府就应考虑提供救助。在称赞救助的政治家中,有一位是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据新闻机构Intercept报道,他有三家酿酒厂是硅谷银行的客户,而硅谷银行的一名高管是他妻子拥有的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自2018年当选州长以来,纽森都在通过一个盲信托持有资产。

在这种制度下,保险规则可被曲解并为大储户谋利——这让人想起我们20年前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的芝加哥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的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芝加哥传统学派声称,市场的自由和公平运作主要依靠明确界定且良好执行的产权。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任何形式的监管都可能被既得利益者所掌控。如果既得利益者能够掌控监管(美联储关于硅谷银行的事后分析报告对2019年的规则调整予以

认可——这一调整允许这类银行机构在较低透明度和更少监管下运营),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掌控产权的定义与执行呢?为什么强大的风险资本家就不会单纯将无保险存款重新定义为有保险存款,从而动用更多的公共利益呢?

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那么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并不是极简政府的必然产物,而是一种政治构建,其只能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发展和生存。否则,其往往会趋向猖獗的裙带关系或(形式较温和的)亲商资本主义,而不是亲市场资本主义。

在我们的这本书中,我们关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生存,因为这些市场可能是最脆弱的——但其结论则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政敌不是那些对体制进行尖刻批判的工会人士,而是穿着职业西装的高管们——他们一边在颂扬竞争性市场的优点,同时又试图用每一个行动来消灭它们。”资本家不是在创造和支持市场,而是在破坏市场的运行——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感受到了来自竞争性市场本身的威胁,而且也感受到了维持市场运作的体制的威胁。“这些在经济上有权有势的人们对支撑自由市场的制度忧心忡忡,因为这种制度待人平等,从而使权势变得多余。”

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非常明显的政府干预之手,市场就无法繁荣——这只手是建立、维护基础设施所必需的,使参与者能够充满信心地自由交易。”但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谁“有动机来推动政府支持竞争性市场?这是因为,即使每个人都会从竞争性市场带来的更好的商品、服务和平等准入中受益,也没有任何人能从维护系统竞争和公平环境中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动力,希望别人来捍卫这个体系。”

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因而并不是确定性演

化过程的终极阶段。“最好把它看作是一株脆弱的植物，它需要培育，防止既得利益杂草的不断袭扰。”

不同体系之间的竞争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旧式保护主义的威胁——而其通常都会将自己伪装成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关切。

我们找出了鼓励这株脆弱植物生长所需的四个条件。其一，现有企业不应过度强大。相反，每个企业必须仅有适度的势力，它因而需要国家扮演公正执法者的角色。

其二，有效的福利制度。“有竞争就会有失败。这些失败对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至关重要，但对受影响的人们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他们遭受的调整成本越大，或是陷入困境的人数越多，实施干预的政治要求就越强烈”，而这很容易被操纵。防止救助政治化的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明确的安全网，直接向受影响的个人提供基本支持。虽然应允许企业破产，但不能让民众破产。

其三，削弱现有企业的势力，迫使它们与不保护低效企业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开展竞争。“削弱现有企业影响立法能力的最有效方法，是使国内市场对国际竞争保持开放。”银行业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行业之一，这并非巧合。因为当其业务主要集中在国内时，它实际上不会面临国际竞争。

其四，我们认为需要说服公众相信自由、竞争性市场的必要性。“如果更多公众能够看到自由市场的好处、了解其政治脆弱性，那么狭隘的利益集团将更难推动自己的议程。”

为什么如今对硅谷银行救助的关注如此之少？与我们当年写书时的环境相比，今天美国的环境是否更不利于竞争性的市场？在某些方面，答案是令人不安的——“确实如此”。

现在，请用相反的顺序思考上文列出的几个条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对银行实施了大规模的直接救助；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又对银行开展了间接救助（通过向家庭和企业进行转移支付，这笔资金又被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在这之后，定期实施银行救助在当前似乎已变得不可避免，这种做法甚至还获得了知识界的推崇。

此外，不同体系之间的竞争（其会凸显出这种任人唯亲做法的低效）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旧式保护主义的威胁——而其通常都会将自己伪装成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关切。当它们强调应只与价值观相似的他国（顺便一提，这些国家也拥有类似的既得利益者）进行贸易时，每一方都会遭受类似的低效率，而来自变革竞争的压力也会减少。2008年，德国、英国和美国接连对银行实施了救助。

可以说，工业国如此不愿看到与市场逆境相关的损失出现，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害怕选民的愤怒——选民们相信资本主义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而竞争（特别是来自他国的竞争）是不公平的。然而，这种恐惧随后又巩固了低效的做法，保留了无能的企业——事实上，它通过消除自由市场对错误的惩罚，使这些企业的表现更加糟糕。

最后，尽管硅谷银行只是美国的第16大银行，但其客户包括了非常强大且有政治联系的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如果反垄断机构使用的是通常的市场支配地位指标，那么它不会对这家银行予以关切。但了解其影响力的人们则会对其忧心忡忡。我们需要根据政治影响力制定出更好的指标，以限制企业的政治权力。^[6]

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

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Katherine Dusak Miller杰出服务金融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是该学院的Robert C. McCormack创业和金融杰出服务教授。

不受欢迎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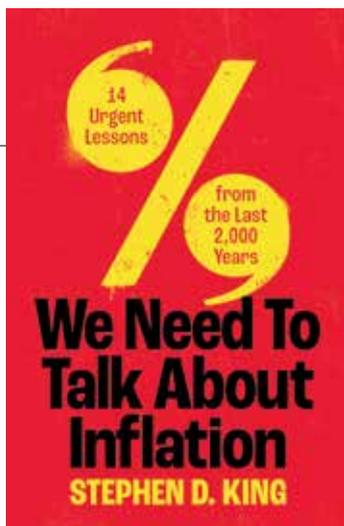
唉，20世纪70年代似乎与今天息息相关。如今，能源供应再次受到质疑。国际秩序再次陷入困境。甚至连音乐也再次应景。厄内斯特·杰克逊（Earnest Jackson）于1975年创作的放克歌曲《通货膨胀》，在当今世界突然显得尤其相关。他在歌中恳求道：“通货膨胀，你为什么不开我的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鉴于此，拥有同样问题的读者最好去读读经济学家斯蒂芬·金的新书。

金认为，我们当前经历的通胀并不主要由少数几种冲击造成（如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混乱，或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是由近年来经济政策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所致。他认为，中央银行采用的框架更偏向于引发通胀——量化宽松，其起初是一种“最后不得已才使用的工具”，目前已使央行“完全上瘾”；而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自身在反通胀方面的信誉，或多或少保证了通胀预期将得到良好锚定”。此外，他担心中央银行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独立，而是受财政当局的压力而行事。

这些观点当然是有争议的；而且，当局是在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期间进行实时的政策制定的，而作者的观点对当局面临的挑战多少有些缺乏同理心。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并在这个过程中描述了通胀的危害，强调了“通胀永远不会在发达经济体中重现”这种观点的荒谬性。

毕竟，通胀的历史十分久远，政策制定者们最好能注意到这一点。作者谈到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例子：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发行的安息券，美国内战时期的美元，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胀。本书还包括了罗马的钱币系统，中世纪货币贬值，以及（如你所料）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本书甚至带我们重温了最近的情况，讨论了英国的迷你预算危机。本书将这些事件串联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幅画面，让故事生动起来，也为有关讨论提供了信息——尽管要找寻过去两千年通胀应对之法的读者们，可能也需要去阅读一些其他书记。

作者提供的教训与建议大多都是相当明



斯蒂芬·金
（Stephen D. King）
我们需要谈谈通货膨胀：过去两千年中的14个紧迫教训
耶鲁大学出版社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2023年，240页，28美元

智的。通胀对政府极具诱惑；通胀会对分配产生巨大的影响，且其可能不是公平、民主的；价格和工资管制表面上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其在理论上行不通，在实践中更是表现糟糕。必

通胀的历史十分久远，政策制定者们最好能注意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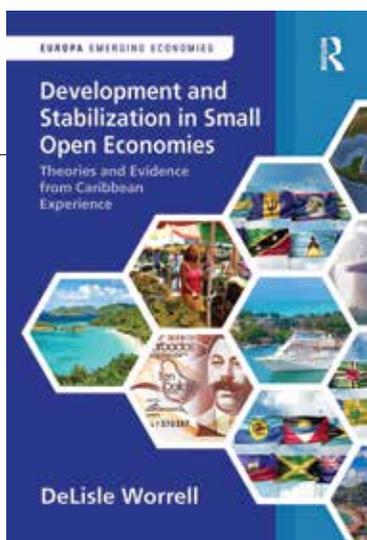
须正面、毫不犹豫地应对通胀问题。不过，如果作者对本书的一些前瞻性要点做出进一步说明，效果会更好。例如，作者赞成哪种“基于规则”的政策框架？作者主张“货币主导”财政政策，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但他给出的最重要教训是非常清楚的：货币的历史很重要。现在，有关货币历史的讨论聚焦于通胀的危险性和予以积极应对的必要性，这是十分恰当的。央行官员们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迅速实施了加息。棘手的是，在我们面对通胀挑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通缩的危险。毕竟，历史上价格下跌造成苦难的例子比比皆是。希望在几年之后，我们不会因为面临通缩，突然发现自己又一次急着需要总结经验教训。FD

马克斯·哈里斯（MAX HARRIS）是沃顿商学院金融政策和监管动议的高级研究员。

小国战略

本书对分析小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此类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作出了宝贵贡献。本书作者于2009年至2017年担任巴巴多斯央行行长。书中的分析借鉴了作者在IMF和巴巴多斯央行的数十年实际经济政策经验。



德莱尔·沃雷尔
(DeLisle Worrell)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发展
与稳定：加勒比经
验的理论与证据**
劳特利奇出版社
阿宾登，英国，2023年，
440页，49.45美元

小型国家资源有限，因而需要专注于少数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沃雷尔阐述了小型国家有何不同之处，以及这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何意义。小型国家更加开放，也因此特别易受外部冲击。小型国家资源有限，因而需要专注于少数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试图将支出转向当地产品的政策通常是无效的。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加勒比地区，决定当地产业（主要是旅游业）竞争力的价格不是以本地货币决定的，而是由它们规模大

得多的邻国——美国——的货币决定的。这降低了下调汇率或货币贬值作为一种经济调整工具的有效性。作者因而认为，钉住汇率制对小国最为有利。固定汇率制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且也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战略的可信度。当出现调整的需要时，当局可以（且必须）使用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尤其是财政政策。

在沃雷尔看来，如果小国无法建立一个维持汇率锚定的框架并形成良好记录，那么弹性汇率制就不是它的最佳选择。对其而言，最佳选择应是完全废除本地货币，而单纯采用主导货币作为其法定货币——就加勒比地区而言，就是使用美元。这有助于消除不稳定的潜在来源，避免央行为政府融资的行为（这可能破坏财政纪律）。沃雷尔认为，加勒比小国应该追随那些决定放弃本币的美洲国家的脚步。

在仅有有限（或完全不存在）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在经济政策中占据核心位置。在税收政策、税收征管、政府支出、公共部门工资政策、债务管理、国企管理等方面，小型经济体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尤为重要，这对加勒比地区来说一直是个难点。教育卫生领域的预算拨款应足够大，以便改善这些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而这也将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大部分消费需求是通过进口满足的，因此，如果缺乏审慎的财政政策，势必会造成国际储备的下降，最终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这在加勒比地区经常发生。

在巴巴多斯，1991年和2018年的国际收支危机都源自于财政政策的失误。在IMF支持规划的背景下，巴巴多斯实施了以财政整顿为中心的政策，成功化解了这两场危机，同时保持了汇率挂钩。沃雷尔对加勒比地区宏观经济调整计划成败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值得深思的见解。FD

伯特·范塞尔姆 (BERT VAN SELM) 是IMF战略团队的一名副主任，他曾于2017至2023年初担任IMF赴巴巴多斯代表团团长。

下一件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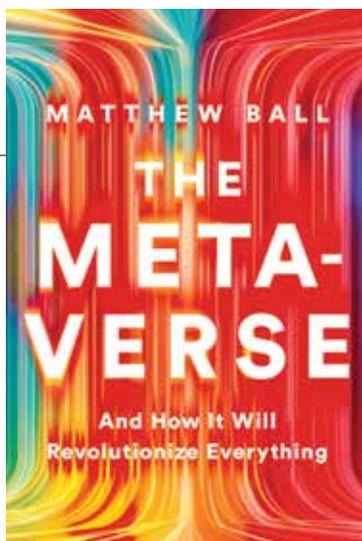
《元宇宙：以及它将如何彻底改变一切》的标题是前瞻性的，但此书不仅关乎未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回顾了过去。本书基于作者马修·鲍尔的一系列博客文章，将前互联网时代的各种轶事与当前时代的全面证据穿插结合，告诉读者：一个可扩展、具有交互性的元宇宙即将到来——且它将带来一场革命。

本书的核心是对“元宇宙”的定义，其按各种概念对其进行了逐个分解和阐释。鲍尔是这一主题的专家人士。他使用简单的比喻，说明了网络、计算、虚拟世界引擎（游戏引擎）、交互性、硬件、支付渠道、区块链等复杂概念。他还带领读者一起研究了Web3和NFT（非同质化代币）在元宇宙演变中发挥的作用——据作者称，元宇宙遭遇了技术、法律和文化的多重障碍。

作者不断强调了“不确定性与困惑是颠覆的特征”这一观点。作者带我们深入研究了个人电脑、互联网、有线电视、手机、流媒体、游戏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历史，并指出元宇宙是真实的，且马上就将到来。

本书最有趣的部分是游戏产业的经济问题——鲍尔最初将该产业称为“价值1800亿美元的休闲产业”。他解释说，该产业“料将改变规模为95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为此，他展示了虚拟世界中共享数据和交互性的经济意义。社会本身正在改变元宇宙——目前，美国约有75%的儿童会在游戏平台上玩游戏，且每年有1.4亿潜在游戏玩家出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鲍尔关于智能手机行业双寡头模式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现状限制了虚拟世界平台的发展，阻碍了不同平台之间的交互性和一体化。这阻碍了以元宇宙为中心的技术发展，为此，他呼吁监管当局采取行动，削弱谷歌和苹果对支付体系及应用商店的控制。

作者揭开了各方关于元宇宙的各种描述带来的神秘面纱。为此，他澄清了元宇宙如何以浏览器为基础而被访问（如通过游戏机、个人电脑、智能手机访问），从而在不



马修·鲍尔
(Matthew Ball)
元宇宙：以及它将如何彻底改变一切
W.W.诺顿出版社
纽约，2022年，352页，
30美元

需要使用虚拟现实耳机的情况下，让使用者获得了一种“个体的存在感”（即你自身的数字形象）。即便如此，许多评论家可能会认为，若能在此书中加入有关运作良好的元宇宙的介绍，则会使其更加丰富。

作者在天使投资、企业风险投资咨询、电视电影制作、视频游戏等领域从业。他也曾警告说，“技术经常产生出乎预料的结果”。在这些基础上，作者呼吁为元宇宙制定治理标准，其与互联网的情况类似——互联网之所以得以发展，要归功于各方在视觉呈现、文件加载、图形数据方面形成的共同协议。

“元宇宙可能侵入我们的生活”——当谈到这个观点时，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警觉起来，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本书使我更加相信，我们需要抓住机会，为这个平行虚拟经济制定相应的监管和标准——这件事宜早不宜迟。FD

普贾·辛格 (POOJA SINGH) 是IMF货币和资本市场部的高级金融部门专家。

关于货币肖像的思索

许多英联邦国家正在重新考虑钞票上应展现谁的肖像

斯米塔·阿加瓦尔

至少在纸面上，变化正在发生。英联邦是一个由14个前英国殖民地以及英国本身组成的集团，目前其君主为英国国王查理三世。2022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去世，引发了整个英联邦范围内的一场讨论：是否应将新君主的肖像印在其各自的纸币上。

女王十分长寿也很受欢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其中一些国家，这一讨论等待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生。“女王的去世是一次地震，它改变了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进程，”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钱币学家、“黑人钱币展览”创始人哈考特·富勒（Harcourt Fuller）说。

在英国，印有国王肖像的新纸币将于2024年与印有伊丽莎白女王肖像的现有纸币同时流通。“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钞票上总是印有君主的肖像，”英格兰银行的首席出纳员莎拉·约翰（Sarah John）表示。伊

丽莎白女王于1960年首次出现在英镑上，而继伊丽莎白女王之后，查理三世国王将成为第二位出现在英镑上的君主。

“人们认为这是我们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她补充道。但在英联邦的其他地方，现在是时候进行重新思索，对艰难的殖民历史进行清算，主张独立身份，推动纪念本国偶像的民众运动了。

自女王于1953年加冕以来，其肖像一直出现在澳大利亚的钞票上。而在最新的5澳元钞票上，其肖像将被新的设计所取代，纪念了该国的土著遗产文化。“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现在正着手与‘第一澳大利亚人’纪录片制作团队就新的设计进行磋商，”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菲利普·洛维（Philip Lowe）今年早些时候对该国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表示。尽管设计和发行新纸币至少需要几年时间，但这标志着它与英国君主关系的一次转变。

图片来自：THE CENTRAL BANK OF THE BAHAMAS



巴哈马央行在2021年发行了一张全新的100元钞票，印有该国前副总理亚瑟·迪翁·汉纳的肖像



图片来自：THE BANK OF ENGLAND

在英国，印有查尔斯三世肖像的新纸币将于2024年流通。

在邻国新西兰，央行称，要用新君主肖像代替20元新西兰元纸币上的女王肖像，还需要“几年时间”——而这与加拿大央行的表述类似。

两年前，另一个英联邦国家巴巴多斯切断了与英国君主的最后联系——其更早地替换了钞票上的女王肖像——并选举了一位巴巴多斯人成为国家元首。

巴哈马央行在女王去世前一年发行了一张全新的100元钞票，以该国的一位为国家独立而战的开国元勋、前副总理亚瑟·迪翁·汉纳（Arthur Dion Hanna）取代了女王的肖像。如今，该国仅在5角钱和3元钱的纸币上还保留了女王的肖像，且短期内并没有任何计划将之替换为新君主的肖像。“如今我们可以展示我们本国的英雄，我对此十分自豪，”在拿骚工作的一位法律顾问琳达·维尔吉尔（Linda Virgill）说。

这种与过去切割的愿望，也是这些国家通过反思殖民主义、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的动荡历史，塑造自身独立身份的更宏大运动的一部分。近期美国发生的相关事件，如2020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在全球引发了强烈反响——这在边缘化群体的国家尤其如此。“这使这些国家能够做出重新评估，并使其

认识到它们必须在社会正义和平等方面实现下一个伟大飞跃。而货币就是这些飞跃中的一个，”富勒表示。

另一个英联邦成员国牙买加于1969年在其货币上移除了君主肖像，现在该国正计划举行一项全民公决，以确定是否选举他们自己的国家元首。在八个国家共同拥有的东加勒比元上，伊丽莎白女王也占有突出的地位。但类似的反思也在进行中。“有些人认为是时候改变方向了。与其继续在钞票上展现英国君主，不如考虑使用我们自己的地标和我们自己的英雄，”东加勒比央行在去年的一份新闻声明中如是说。

即使数字钱包和二维码成为一种新常态，实体货币可能仍会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我一直认为纸币是我们民族认同的核心，”约翰说。这场恢复民族认同的斗争正在席卷整个英联邦。“最终，将谁印在纸币上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永垂不朽的机会，”富勒说。“有时，符号比它们所代表的实际事物要强大得多。”^{FD}

斯米塔·阿加瓦尔 (SMITA AGGARWAL)

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时事热点 免费赠阅



出版物

全球经济，尽在指尖

IMF.org/pubs

Chinese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2023



MFICA2023002